



2019金城峰会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系列研究报告

2019金城峰会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系列研究报告

本系列研究报告是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依托学科优势倾力打造的服务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

2019年度《甘肃十大绿色生态产业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系列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1. 《基于政务信息公开的甘肃省州市政府绩效评价报告：2019》
2. 《甘肃省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治理能力评价报告》
3. 《甘肃省绿色发展指数报告》
4. 《西部地区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状况报告——基于政府履行法定职能的调查分析》
5. 《新时代甘肃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6. 《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研究》
7. 《“一带一路”甘肃枢纽制高点建设研究报告》
8. 《甘肃中小房地产企业的绿色发展之路：管理问题、转型出路与战略对策》
9. 《甘肃农村基层治理研究》

主办单位：兰州大学

承办单位：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兰州大学企业创新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兰州大学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 甘肃大地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电话（传真）：0931-8910402

电子邮箱：glxy@lzu.edu.cn

互联网址：http://ms.lzu.edu.cn

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自主供给研究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2019年12月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简介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学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9年国立甘肃学院时期设立的银行会计专修班。2004年2月，学校批准成立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学院专业设置涵盖了公共管理、工商管理2个一级学科。现有公共管理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自主设置了政府绩效管理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有公共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公共管理、工商管理是甘肃省重点学科和甘肃省优势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公共管理获评B+档（学科前10%~20%），工商管理获评B档（学科前20%~30%）。有工商管理硕士(MBA, 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和国际工商管理硕士(IMBA))、公共管理硕士(MPA)、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授权类型，MBA教育已形成了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的MBA项目之一。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领导的《世界经理人》杂志评选中连续11年进入“中国最具影响力MBA排行榜”前10名。MPA项目在全国第二批MPA试办院校的教学合格评估中位居第3名。学院设有甘肃省管理学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本科生人才培养基地，有行政管理、会计学(含ACCA方向班)、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5个本科专业，其中行政管理专业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是甘肃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根据综合、交叉、弹性、开放的原则，学院成立了战略与组织管理研究所、危机信息管理研究所、运营与财务管理研究所、服务管理研究所、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管理研究所；兰州大学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是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兰州大学共建的研究基地，是甘肃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也入选了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中心已建设成为集中国政府绩效评价、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咨询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学术机构。现有兰州大学企业创新研究中心、兰州大学应急管理研究中心、兰州大学绿色管理研究中心、兰州大学医院管理研究中心、兰州大学华夏文化资源数据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兰州大学管理科学研究院(深圳)等6个校级研究机构。

建院以来，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积极吸引高层次人才来学院工作，现已建成一支专职与兼职、固定与流动相结合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学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为建设一流学院奠定了师资基础。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秉承兰州大学“做西部文章，创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通过“人才强院、国际化和学院文化促进发展”三大战略的组织实施，正在快速向“高度开放、研究支持、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综合型管理学院”的目标迈进。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院训是“学习管理就是学习成功”。

金城峰会简介

“金城峰会”由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发起，是专注并探讨甘肃省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高端交流平台，旨在促进大学、企业、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合作，汇集各方智，探讨甘肃发展的重大问题。

峰会每年确定一个主题，于12月中旬举办，由企业家、政府官员、著名学者、社会名流、商会领袖共同参与，并根据需要不定期地设置分论坛，邀请相关领域高端人才就某一主题进行探讨交流。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能力，为甘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将在深入分析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未来基础上发布年度系列研究报告。

“金城峰会”已举办五届，成为甘肃省集政府、企业、大学、社会于一体的“高端平台、高端智慧、高端成果、引领潮流、把握未来”的年度盛会和服务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品牌项目。

2019年“金城峰会”主题确定为“甘肃十大绿色生态产业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峰会将深入探讨甘肃十大绿色生态产业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议题，为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甘肃样本”建言献策，帮助甘肃加快绿色发展崛起进程，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治理做出应有的贡献。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2019金城峰会



扫描阅读金城峰会系列报告

2019 金城峰会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系列研究报告

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自主供给研究

项目负责人：李少惠

项目组成员：吴嘉欣、于 浩、韩 慧、赵军义

联 系 人：李少惠

联系电话：13993180160

电子邮箱：lishaohui218@163.cn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声明：本系列研究报告版权归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所有。未获得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系列研究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本系列报告基于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项目研究团队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但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均不作任何保证，也不承担任何外部机构或个人因使用本系列研究报告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摘要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国家文化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广大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十三五”时期是甘肃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加快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对于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是基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及民众文化权利意识的广泛提升所产生的新型供给模式，是由基层群众自发组织、自主供给，具有娱乐自我、服务大众的双重优良效应。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紧密切合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凸显了基层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同时与国家大力提倡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高度契合，已经成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必然趋势之一。

本研究立足实际，以当下蓬勃兴盛的广场舞团队为研究样本，探讨城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组织形成过程，探究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发掘过程要素对自主供给的作用机制，以期进一步把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路向，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野。研究发现，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遵循着包含内生需求与外在支持的逻辑起点、载体构建与空间整合的逻辑进路以及心理默契与情感价值回归的逻辑终端在内的整体逻辑走向。生发逻辑隐含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从无到有、步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路径，对于构建以群众为主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大有裨益；而基于自主供给重要影响因素的分析所提出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优化路径与举措建议希望能有利于提升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效率，助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共建共享目标的实现。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一、研究缘起	1
二、研究价值	2
三、核心概念	3
(一) 自主供给	3
(二) 公共文化自组织	3
(三)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4
(四)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	4
四、研究设计	4
(一) 研究主旨	4
(二) 案例选择	5
(三) 研究方法	8
第二章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形态	9
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价值形态	9
(一) 多元供给模式的纵向拓展	9
(二) 涟漪式的城市文化流	10
(三) 持续提升的城市文化气质	11
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实践形态	11
(一) 集体性的公共参与	11
(二) 广泛性的公共交往	12
(三) 互利性的公共合作	12
(四) 共建性的公共领域	13
第三章 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15
一、公共文化自组织的架构与特征	15
(一) 公共文化自组织架构	15
(二) 公共文化自组织系统	16

(三) 公共文化自组织特征	16
二、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形成过程	18
(一) 形成阶段：以兴趣为核心的团队组建过程	18
(二) 发展阶段：以“隐形契约”为核心的团队管理制度	19
(三) 平稳阶段：以“常态化”运作为核心的团队发展过程	19
(四) 衰落阶段：以组织“突变”为核心的团队解散过程	20
三、公共文化自组织发展的动力因素	21
(一) 竞争：公共文化自组织发展的前提	21
(二) 协同：公共文化自组织发展的保障	21
(三) 基于动力要素的公共文化自组织发展全过程	22
第四章 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	23
一、文化需求衍生——自主供给的逻辑起点	23
(一) 主观爱好与健康意识的彰显	23
(二) 观念认知转变	24
(三) 历史记忆与心理情愫的唤起	25
二、社会条件进步——自主供给的外在支持	26
(一) 社会形态的微观变换	26
(二) 文化政策与制度支持	28
(三) 生活质量改善与参与成本反向行之	29
三、文化团队组建——自主供给的载体构建	30
(一) 雏形搭建：文化精英的引领示范	30
(二) 身临其境：陌生成员的浸入体验	31
(三) 关系嵌入：文化团队的认同吸纳	32
(四) 情感共鸣：团队成员的凝聚共融	33
(五) 形象价值：团队品牌的内涵塑造	34
四、文化空间整合——自主供给的情境叠加	36
(一) 硬件支持：物理场所的基础性供给	36
(二) 软件支持：文化资源的补给性填充	37
(三) 环境机制：娱乐氛围的调剂性渲染	38

(四) 心理机制：文化与情感的互溶	39
五、社会资本积累——自主供给的默契重组	41
(一) 联系机制：社群网络的模式化构建	41
(二) 互惠机制：社群成员的常态化帮扶	42
(三) 信任机制：社群网络的潜在性成长	43
(四) 非正式制度：社群网络的共在性惯习	44
六、情感价值回归——自主供给的文化呈现	46
(一) 自我效能感的逐步渗透	46
(二) 公共精神的不断延伸	47
七、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梳理	48
(一) 内生需求与外在支持：自主供给的逻辑原点	48
(二) 载体构建与空间整合：自主供给的逻辑进路	49
(三) 心理默契与价值回归：自主供给的逻辑终端	51
(四)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的模型构建	52
第五章 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模型修正	53
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生发逻辑的理论回嵌	53
(一) 组织场域：文化资本、结构嵌入	53
(二) 社区场域：社会资本、关系嵌入	54
(三) 社会场域：象征资本、认知嵌入	55
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生发逻辑的重新审视	56
(一) 组织系统要素协同：从波动到稳态的互动逻辑	56
(二) 社群网络关系塑造：从关系到资源的交换逻辑	56
(三) 微观文化生态渗透：从外在环境到主体意识的嵌套逻辑	57
第六章 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路径优化	59
一、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制度环境	59
(一) 明确基层政府的职责与角色	59
(二) 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经费保障制度	59
(三) 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与合作机制	60
二、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孵化工作	60

(一) 增强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开放性	60
(二) 确保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自主性	60
(三) 提高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人才素养	61
三、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质量水平	61
(一) 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内容	61
(二) 创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形式	62
(三) 拓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空间	62

第一章 引言

一、研究缘起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国家文化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广大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自本世纪初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以来，取得了极大成就，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加旺盛，这意味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应该提质升级，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心下移、资源下移、权力下移，推动公共文化供给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强化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于是，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被打破，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等社会各方协同参与的“交互理性”的制度框架^[1]，旨在以多重力量增加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是基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及民众文化权利意识的广泛提升所产生的新型供给模式，是由基层群众自发组织、自主供给，具有娱乐自我、服务大众的双重优良效应。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紧密切合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凸显了基层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同时与国家大力提倡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高度契合，已经成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必然趋势之一。

自主供给模式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化供给的一个崭新模式，是通过自愿的方式主动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以满足民众需求。相比于政府权威型供给、市场商业型供给及其他社会化供给模式，自主供给更加符合供给主体的实际需要，且供给成本更低，参与度更广、效率更高。当今全国各地兴盛不衰、覆盖城乡大街小巷各种公共空间的广场舞正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典型代表。民众自发聚合在街头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以舞蹈、合唱、戏曲、乐器演奏为主要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广场舞团队也以其自愿性、娱乐性的鲜明特征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积极参与的文化自组织。这既是群众保障自身文化权益，拓展文化空间以及满足自身精神文化需求的有益行为，也为拓宽公共文化供

给模式提供了新的途径。

本研究立足实际，以当下蓬勃兴盛的广场舞团队为研究案例，探讨城市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厘清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发掘过程要素对自主供给的作用机制，以期进一步把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路向，创新公共文化供给模式，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助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共建共享目标的实现。

二、研究价值

“十三五”时期是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提升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对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赖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参与，公共文化自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能紧密契合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凸显了基层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对于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精准性大有裨益。通过研究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能够丰富公共文化自组织的理论研究成果，为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孵化培育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促进民众的文化自觉。

第二，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活动虽早已有之，但实践中的供给效果却并不理想，学界也并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对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问题展开研究，一方面可以从“自主供给”层面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理论，拓宽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理论视野，深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关于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生发逻辑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完善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模式，推动基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第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由基层群众自发组织、自主供给，具有娱乐自我、服务大众的双重效应。研究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可以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促进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使基层人民群众相对公平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助推

甘肃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三、核心概念

（一）自主供给

本研究将“自主供给”定义为：居民为满足自身某种需求，在整合社会资源的基础上，自愿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自主参与，自我管理，从而达到满足需求的过程。相应地，自主供给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1.供给主体为民众自身，主要以自组织的集体行动为呈现对象。2.供给具备自愿性，其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决策自由，也即个人做出决策时并未受他人强迫，能够依照自我意愿做出决策；二是符合自身的决策导向，所谓决策导向是指个人做出决策时所参考的理性、可行性原则，若符合这样的原则，那么个人则可能做出自愿性的决策和行为。3.供给的主要目的是满足需求，自主供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个人或组织的需求，源于其他供给方式的弊病，自主供给更加注重供给和需求的无缝对接，实现供给主体与客体的角色统一，从而达到资源利用的最高效率。

（二）公共文化自组织

自组织理论产生于自然科学领域，源自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协同学理论等，主要用于分析复杂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即复杂系统如何在非外力干预下，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和运行机理。自组织演化动力来自系统内部，是系统自发生成，由组织内部的元素、构成体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产生组织发展和演化动力，推动组织逐渐有序化、结构化的过程。

公共文化自组织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以提供公共文化，满足自身文化需求为目的，定期开展文化活动，有相对稳定的运作机制和组织模式的民间文化组织。在我国公共文化自组织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基因和流传历史。例如，在民间有依托民风民俗形成的社火、庙会、自乐班等文化组织便是公共文化自组织的一种类型。与其他组织类型相比，公共文化自组织兼具文化内涵和自组织模式，这两点构成了公共文化自组织区别于其他组织的鲜明特征。相较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

活动，公共文化自组织能够提供长期性、低成本、贴近民众生活的公共文化，能够有效弥补政府供给公共文化缺位的现状。

（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行为的制度与系统的总称。宏观上讲，公共文化服务具备公益性、公平性与均等性，因为它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不具有经营属性的文化产品或服务，同时也不因供给对象的身份、地位、收入等而差别对待，因此保证了文化资源配置的均等性，是一种社会性服务，最终目的是实现公民的文化权益，提升社会整体的文化生活水平，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发展。本研究聚焦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意在探讨社会组织中最低一层、与群众联系最为密切的文化服务，因此本研究范围限定在城市街道、社区一级的公共文化服务，并将其作为本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

（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

自主供给的对象在公共范围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物品的提供，例如道路、庙宇、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等；另一类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例如公共体育、农业生产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等。本研究的研究对象聚焦于街道、社区一级的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也即群众有自愿参与的意愿和动机，向自我和社会公众提供具有公益性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文化活动或服务，从而维护群众整体的文化权益的行为和过程。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主旨

本研究旨在回答“城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这一核心问题，目的是为了挖掘城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一般性规律，为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实践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聚焦 L 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场域，通过实地调研获取一手资料，借助 Nvivo11 质性研究工具，深入分析城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影响因素，明确其逻辑走向，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探讨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优化路径。

（二）案例选择

本研究严格按照样本的典型性、代表性和可行性原则，选取了甘肃省兰州市作为样本确定地点，探讨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演化过程。作为一个省会城市，近年来兰州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组织蓬勃兴起，自主供给活动形式多样，开展频次越来越高，参与群体也日渐扩大多元，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故而在兰州市城区选择了兰妹舞蹈队、日月山锅庄舞团队、双人舞团队、楼兰之韵新疆舞蹈队、兰州锅庄舞蹈队、夕阳红老年合唱团与秦腔自乐班等作为本研究的案例。兰妹舞蹈队、日月山锅庄舞团队、双人舞团队将用于分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组织形成，楼兰之韵新疆舞蹈队、兰州锅庄舞蹈队、夕阳红老年合唱团和秦腔自乐班将用作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演化分析。研究所选取的7个案例，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来考虑的：一是案例可接触性；二是案例具有较长的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发展过程；三是所选案例要具有可比性，避免同质性。

1. 兰妹舞蹈队

兰妹舞蹈队成立于2016年5月6日，以跳新疆舞为特色。初始人员只有三人，分别是Z女士、M女士、C女士，三人均未系统学习过舞蹈，跳舞完全是出于个人自身爱好，其中Z女士和M女士舞蹈天赋好，被团队成员尊称为老师，C女士出于兴趣爱好而自备音响设备，并邀请邻居好友一起跳广场舞。后来团队一致决定并自筹经费，送舞跳得最好的Z女士去新疆参加培训学习，学成后教与成员新的舞蹈花样，此举很好地扩大了团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由于舞蹈比较新颖，兰妹舞蹈队还受邀参加某一社区的公益演出，得到了社区方面的赞扬，同时也大大激发成员的参与热情。

2. 锅庄舞团队

兰州日月山锅庄舞团队成立于2007年6月，现如今已经发展成状态稳定、拥有固定团队成员的广场舞团队。锅庄舞是藏族的三大代表舞蹈之一，深受藏族民众喜爱。如今也流传至全国各地，成为引领广场舞的一道靓丽的风景。锅庄舞动作舒缓优美，节奏明快，音乐辽阔别致，吸引了很多人围观。自组建之日起，

团队规模便不断扩展。但团队人数随季节变化比较明显，冬天往往因气候寒冷参与人数较少，日常维系在三四十人左右，夏天则为参与旺季，可达百人以上。相比而言，该广场舞团队在制度建设、运行状况、团队规模、团队氛围等方面较之其他团队有着明显优势。团队形成规模后就在兰州市城关区体育局备案，将团队情况进行了详细登记，这也是东方红广场上唯一进行过备案的广场舞团队，因而每当文化馆、体育局等文化机构有演出需求时，经常会邀请他们参与，锅庄舞团队通常也不会拒绝，会认真准备，也多次在表演活动中获奖。为了维持团队良好的团队氛围，他们还会经常组织聚餐、集体户外活动等，这些文化活动和集体活动的开展，使得团队文化氛围更加和谐，团队成员之间联系更为紧密。

3. 双人舞团队

双人舞团队是广场上最小的广场舞团队，这个团队人数最多时是 17 人，最少时不足十人，是东方红广场十个广场舞团中规模最小的自组织。双人舞团队的管理者只有 L 先生一个人，L 先生年纪比较大，有八十三岁，是东方红广场上广场舞团队中最年长的管理者。携带一个便携式手拉音响和一个小马扎，L 先生每天晚上 7 点 50 分准时到广场中间必胜客前的空地，然后打开音响播放音乐，坐在马扎上等队员来。L 先生虽然身为双人舞团队的管理者，自己却很少跳舞，以观看其他成员跳舞为主。后来团队解散。

4. 楼兰之韵新疆舞蹈队

楼兰之韵新疆舞蹈队成立于 2016 年，现如今成员已经达 70 余人，该舞蹈队以公园为主要活动地点。该舞蹈队队员表演时都会身着新疆服饰，女士身穿色彩绚丽的裙子、佩戴长辫，男士身穿长衫并佩戴六角帽，融合欢快喜庆的维吾尔族音乐，使得整个舞蹈表演极具正规性和观赏性。因此每逢表演都会吸引大批群众围观，场面甚是宏大，成为了整个公园关注的焦点。由此，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楼兰之韵新疆舞蹈队吸纳了七十多名群众加入，其中不乏男性成员。通过互相沟通与请教，新老成员形成了良好的指导学习氛围，推动着舞蹈队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了周围居民共享的文化盛宴。

5. 锅庄舞蹈队

兰州市锅庄舞蹈队成立于 2013 年，成立之初仅有 5 人，现在发展至 50 余人。队长李先生年轻时曾在西藏当兵服役，被当时在艰苦的生活中，藏族同胞们热爱

生活、积极乐观而跳起的锅庄舞深受感染，因此对此具有深切情怀。李先生退役后回到兰州市，为丰富业余生活，联合几个朋友在公园内跳锅庄舞，不曾想藏族优美的音乐和热烈的舞蹈气氛吸引了公园内许多民众的驻足观看。由此，该舞蹈队逐渐吸纳了多位热爱锅庄舞的群众加入，使得舞蹈队愈发壮大。

6.夕阳红老年合唱团

夕阳红老年合唱团成立已经超过十余年，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领唱者、指挥者、伴奏者、队员、场务等完善的组织架构。该合唱团团长郁先生原为某音乐学院教师，退休后加入该合唱团，因其演唱专业的功底而被队员推选为团长，指导队员演唱。每周选取一到两首大家喜闻乐见的歌曲进行编排和训练，不仅有旋律优美的和声，也有慷慨激昂的高音，经过多遍演练达到声部和谐、抒情达意的整体效果。因包含对过去艰苦生活的历史记忆，夕阳红老年合唱团有着回忆历史的独特功能，成为了众多老年人每日最向往的地方。参与演唱不仅能够调剂寡淡无味的老年生活，重塑健康乐观的精神面貌，也能够打造交友沟通的良好渠道。近年来，该合唱团不仅吸纳了诸多老年人加入，甚至也吸引了一些还未退休的中年人，他们平时忙于工作，只在周末参与合唱，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参与方式，推动着合唱团逐步扩大、走向年轻化。

7.和谐秦腔自乐班

秦腔是西北最古老的戏曲之一，因其独特的唱腔、多样的角色、排列整齐的唱词、循序渐进的曲调以及尖细清脆的伴奏，即使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依然呈现出经久不衰的特质。随着城市化的扩张，秦腔在城市中逐渐销声匿迹，出现了文化遗产消亡的隐忧。但是在广大的西北农村，秦腔依旧展现着原始风采。在兰州市周边县区有一群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每逢周末便聚集在广场上进行一场唱秦腔的自我表演。自乐班原本只是凑上三五个打工好友，带上板胡（板胡是秦腔演奏中最主要的乐器，最能体现秦腔板式变化的特色），找个宽阔的场地唱上几句，也成为缓解平日工作辛劳的一种“文化休闲”，但是由于秦腔特色鲜明，声音嘹亮，很快便吸引了志同道合的农民工参与其中，后大家共同取名为“和谐秦腔自乐班”。这不仅成为农民工群体在周末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更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共同记忆与在城市陌生环境中互相支撑的心理慰藉。因此，该秦腔自乐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渐提升，成为基层群众自主供给典型代表。

（三）研究方法

1.扎根理论方法

扎根理论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意在立足于现实资料，精准描述现象本质，从中抽象出理论精髓，达到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目的。其基本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旨在通过科学的归纳、演绎、对比、分析，螺旋式的逐级提炼概念、范畴及其关系的抽象层次，并最终发展为理论。本研究过深度访谈获取大量一手数据作为原始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分析，逐级归纳基层公共文化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

2.深度访谈法

本研究以兰州市各文化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为搜索范围，与活动所在地的文化活动团体的负责人、成员及旁观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式观察，重点了解群众自主供给的过程要素及演化逻辑，并从与研究对象的深度访谈中发现新的研究问题及相关的概念和范畴，由此收集数据作为原始资料，以备编码。

3.案例分析法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法，考虑到结论的普适程度，案例的选取还应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故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选取了兰州市7个文化活动团体作为案例分析对象，通过访谈和资料收集，以使各类数据相互补充和印证。

第二章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形态

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价值形态

（一）多元供给模式的纵向拓展

公共文化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质，最初以政府为供给主体，这种“输血式”的供给方式往往产生与民众需求不符的巨大鸿沟，而市场化的供给又容易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难以保证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当引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复合供给模式之后，供给主体逐渐转向多元化，聚合多方力量以满足民众的文化需求。民众自主供给作为社会化供给的一个分支，蕴藏着巨大的内生力量，不仅可以减缓供需错位的张力，也能有效降低政府与市场的供给成本。

目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是源于城市居民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后提升精神需求的目的。首先，随着政府部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逐年完善，兴修的各大广场、公园都成为群众活动的主要根据地，数量众多的活动群体有地可去，为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随着经济水平逐年上升，市场部门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各文化团体的帮扶，如提供商演机会与奖励，为扩大企业知名度而为各类文化展演冠名赞助等等，这些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基层文化团体的成长的土壤。再次，城市文化类协会也在逐年兴起，它们发挥着保护文化遗产、弘扬特色文化的作用，对公共文化服务增添了一臂之力。最后，作为城市的主人公，在生活质量改善的情况下，民众更加追求精神文化的富足，也更愿意展示自己的热情与参与意愿。因此，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群体的自主供给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逐年兴盛的重要因素。

至此，以政府为主导角色，市场为辅助角色，社会组织为补充角色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迎合了基层民众最质朴的文化需求，也在弥补以往单一供给机制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形成了多元汇集的供给形式。自主供给不仅能够满足群众自娱自乐的初衷，也为城市的文化建设增添了一股重要驱动力。

（二）涟漪式的城市文化流

“文化流”是一个连续发展、变化、传播的过程，它具有动态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将文化比喻成一个活的流体，意在展现多个个体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从时间轴上来审视文化发展，文化流是纵向的，依托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变化，从横向维度来审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恰恰就如涟漪一般圈圈晕染开来，使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化得以传播和蔓延。以广场舞为典型代表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曾一度掀起“中国大妈”的狂热喜爱，值得注意的是，持续了十多年的“广场舞热”现在已经渐渐转型，从以往通俗的音乐舞蹈拓展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紧跟时代步伐的唱演结合形式。不仅有突破地域限制的多民族特色舞蹈元素的加入，也有古老戏曲的“复活”，不仅有紧跟流行音乐的唱和，也有网络表演元素的代入。可以说，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已经摆脱了单一的舞蹈样式，步入了一个能够满足多样化需求且引领潮流的品质文化阶段。

城市之所以产生文化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的集聚流动在无形中带来了多民族文化的传播与流动，为城市带来了一股浓郁的民族特色。这些文化元素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又迅速流向其他地域，被一些热爱文化的精英人士所引领，从而推动了特色民族文化转移的“文化流”。另一方面，在经历了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流失的低谷之后，无论缘于政府的多方宣传还是老艺人对于原始艺术的不懈追求，原本在城市范围内几乎销声匿迹的秦腔、花儿、腰鼓等民俗文化又呈现了复活的趋势。几个老艺人、一把二胡、一把板胡、一个音响、一个话筒，就能凑起一场原汁原味的民俗表演，简单不失活力，质朴无畏华丽，淳朴的唱腔，嘹亮的歌喉，强有力地宣示着这些古老的民俗戏曲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由此也能吸引在各个城市角落里默默无闻但继承着这些优秀文化的老艺人们。由此，民俗戏曲在历经“冷对待”的窘境之后渐渐迎来被再度重视的“热捧”状态。

不同性质的文化流从四面八方流向城市，又在城市内传播、发展，再度流向更远的地方，如同湖水的涟漪一般，层层展开，渐次远扬，使优秀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让更多的城市居民接触、感受并身体力行地完成文化传播的使命。

（三）持续提升的城市文化气质

“气质”是一个人固有的心理活动的稳定的动力特征^[2]，而“文化气质”则意在表现文化由内向外散发的品性风度和内涵。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对于城市发展的理想追求和不断实践的结晶成果^[3]，它不仅表现着城市发展的传承记忆、个性展示，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精神支柱，更是一种思想智慧，从而也能影响城市气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机制，外在表现为以满足自身的文化偏好为目的，以群众集体性自娱自乐为主的活动形式，内在则是对文化精髓的高度传承与再次创造。群众在文化活动中不仅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品性熏陶，培养起群众作为文化主体的自主性，同时也以各文化团体为中心，将文化形式和内容以辐射的方式散发至城市的各个角落。随着城市人口活动地点的转移和流动，这种“文化辐射”有力地促进城市文化气质的提升。为达到良好的表演效果，文化团体可以借助多渠道的学习，通过网络力量和专业人士将表演精细化，在整合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创新，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原本单一的文化元素。同时，优秀民俗戏曲的常态化表演，也推动着民俗文化在城市地域内的普及和推广，让更多的年轻人接触、熟知甚至喜爱戏曲文化。笔者在走访观察的过程中发现，原本印象中以老年人为主要支撑群体的秦腔剧团，竟不乏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有的是从小受家庭文化的熏陶，对戏曲也有着深刻的情怀，有的则是因为生活环境中能够接触到这样的秦腔表演而产生喜爱之情。可以说，群众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自娱自乐的本质，更是折射了一个城市集学习、创新、融合、借鉴于一体的创作精神，无不透露着城市因文化带来的品质内涵，从而展示了城市高调的文化意蕴。

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实践形态

（一）集体性的公共参与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以理性主义为原则，以效率为主导价值，在这种效率至上的认知模式下，公众因素就成为了一种阻碍^[4]，无疑遮蔽了公民参与的价值认知。现代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以公平为主导，而公平则强调回应与参与。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言：“新公共行政对回应性和社会公平的承诺意蕴着参与”^[5]。因此，公民

参与散发着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人的需要和意图以及主体价值观的建构对事物的发展具有主导意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模式的实质就是集体性的公民参与。自主供给是由基层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大小不同的文化团体所构成，具有柔性边界、开放决策、进退自由的显著特点，这就极大地吸引了更多喜爱文化活动的群体加入，广大群众以非正式的参与渠道和出场方式加入其中。参与活动的个人能够在活动团体中表达自我的文化需求，从而影响着微观意义上的公共活动和公共决策，展现着独特的民主和公平诉求。也就是说，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已经逐渐从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供给和市场化具有盈利目的的供给逻辑中脱离出来，转而向更广泛的民众参与、自由决策中去，强调了公众集体性参与的价值理性，同时也以实践形态深化着社会对于公民参与的价值认知。

（二）广泛性的公共交往

集体性的公共参与塑造了一个以公平和开放为核心纽带的文化团体，而内部则是一个充满友好沟通的公共交往界面。如果将每一个自发的文化团体看作是一个基本单元，那么社会中众多该类文化团体就形成了一个无边界的交际圈。源于这种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则可能会催生出群众的公共意识。参与文化活动的群众心怀丰富娱乐生活的初衷，实际上也造就了一个包含公共性的交往渠道。现阶段，以看电视、上网为代表的私性文化有了长足发展，公共文化生活却严重式微，这实际上透露出公共文化生活的落寞与无奈。而基层公共文化的自主供给恰恰成为对抗私性文化的一种有力方式。人们在自发的文化生活中，不自觉地扩大了交往面，在交流学习中也品味了集体的价值追求，从而不同程度地改善了个人的精神面貌。以中老年人为主要群体的广场舞团队就鲜明的展示了广泛性的公共交往的具体形态。一方面，老年人退休以后进入了一种慢节奏的生活状态，在空虚的平日里更希望有娱乐活动的调剂，另一方面，在文化活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往往能够产生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就使得在周边驻足观看的群众产生跃跃欲试的心理，随之公共文化团体愈发壮大，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三）互利性的公共合作

“合作”意指个人或者群体之间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而进行联合行动的过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深刻隐含着“公共合作”这一关键词。起初，个人因兴趣爱好与三五朋友组建起一支简单的队伍，用于自娱自乐，在队伍的常态化的坚持中会吸引志同道合的陌生人跃跃欲试，从而也加入其中，当团队逐渐发展壮大到一定规模，便形成了一个具有稳定性的非正式制度，无论是知名度还是影响力的扩散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团队的整体素质，团队从内部的成员发展转至外部拓展，此时会受邀参与一些商业演出或是社区比赛等活动，进一步鼓励了团队成员的整体士气和外围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不乏有若隐若现的合作机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当团队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陌生群众时，在舞蹈或唱演方面形成了新老成员的互相指导、学习和配合，目的在于提升团队的整体质量；其次，团队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物质支持，当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后需要根据团队日常的实际需求而向队员收取电费、服装费、设备购置费等必备费用，虽然数额不大，但是也需要在公平条件下实现人人参与、人人贡献的机制，此时，成员着眼于团队得到良好发展，大多乐意自行承担一部分必要费用，这也是合作的一部分。最后，当团队发展成熟后参与的一些商演、比赛时，团队又与外部人员进行了一次正式合作。以商演为例，商业部门为实现自己的某种利益而邀请各文化团队演出，无论是否支付演出费用，只要实践得以形成，就达成了一种合作关系，同时又满足了双方的利益需要——商家达到了宣传目的，文化团队也实现了提升知名度、鼓励队员的目标。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实质上完成了内部与内部、团队与外部之间的多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的建构是基于合作方不同的利益诉求的事实，构成了一种具有互利性、非固定式关系的合作关系网络，网络中的多元主体构成了一种“互相需要”的社会联合体的现实图景，致力于公共性的扩散机制形成。

（四）共建性的公共领域

在继公民的公共参与、公共交往、公共合作之后，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便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建属性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个人展示自我的地方，在这里展示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为人所见、所闻，具有最广泛的公共性^[6]。群众对于公共

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不仅支撑起了不同群体交往联络的文化圈和交际圈,这种非正式的“圈层结构”实质上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领域是一个群众通过言论和行动展示自我、进行活动的领域。换句话说,群众在自发性的文化活动中,不仅享受的是一种满足自我价值的文化需求,更在此基础上塑造了一个所有人共同聚会的场所,每个参与者在该场所内都有着不同的位置和话语,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倾听、理解、协商甚至做出决策。如团队中的领导者,负责时间的安排,活动的组织,对外的沟通和协调,场务负责音响、话筒等设备的保管,队员则进行活动的开展以及对新纳入成员的交流和指导等等。在一个文化团队中,每个人既分工明确,又灵活转换着角色,整体上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柔性的、无边界的责任意识 and 行动意识,从而促成了一个微型公共领域的构建。久而久之,整个公园、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也就演化成一个活泼生动的中型公共领域。该领域因群众的自发性行动而形成,又为群众的自我彰显提供了有效空间,也即为公民参与提供了基础领域,形成了“行动-空间-行动”的双向循环机制。只有在人们如此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以致行动的潜能始终在场的地方,权力才与他们同在^[7],重视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要素,才能构建起公共领域的物质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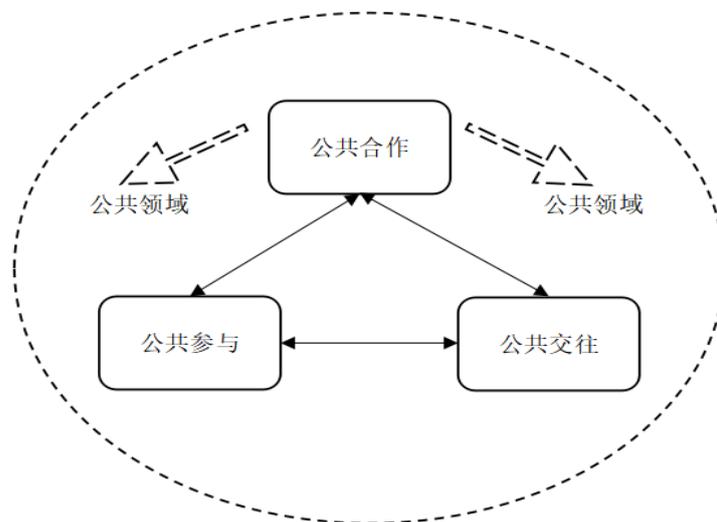


图 2-1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实践形态

第三章 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重要载体，具备公民自发组织、自我经营、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通过向当地民众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本章以甘肃省兰州市东方红广场三个广场舞团队为研究案例，探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为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演化分析奠定基础。

一、公共文化自组织的架构与特征

（一）公共文化自组织架构

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稳定的广场舞团队成员主要由管理者、舞蹈老师、普通成员和离散成员共同组成。

表 3-1 公共文化自组织成员构成

类别	特征
管理者	广场舞团队的核心，在团队中担任组织、领导等重任
舞蹈老师	负责教授团队成员舞蹈动作，并在广场舞中担任领舞的角色
普通成员	有固定参与时间，但并不参与团队管理工作的成员
离散成员	参与频率不固定，或者只围观不参与

在组织架构上，东方红广场舞团队基本形成了以团队管理者及舞蹈老师为核心的管理层（在团队中舞蹈老师负责学习、编排舞蹈，并教授团队成员舞蹈动作，但是这些舞蹈老师也会负责团队的相关管理事务，甚至在有的团队中，舞蹈老师和专职管理人员合二为一，因此，本研究将舞蹈老师划归为管理层），根据团队规模大小，管理层人员数目不一。团队主要采取以管理者为核心、层级相对单一的组织架构。即便是在一个有相当规模和相当人数的广场舞团队中，其治理层级通常为两级，组织结构更为扁平，管理层级界限模糊，权责重叠。通常来讲团队管理者是团队最初的发起人，但是在团队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一些新的管理者。如锅庄舞团队中的 L 女士一开始并非团队的管理者，在加入团队后一段时间才进

入管理层。由于 L 女士舞蹈跳得好，慢慢成为团队新的舞蹈老师，担任团队领舞的职位，加之她为人热情，与团队管理者及其他成员相处较好，威望比较高，后来受团队队长邀请，担任团队管理者的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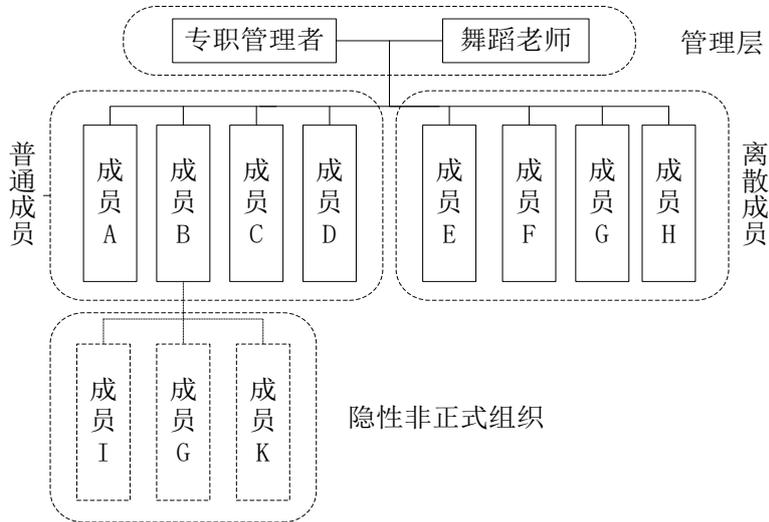


图 3-2 公共文化自组织架构图

（二）公共文化自组织系统

公共文化自组织系统由多个子系统构成，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组织系统的发展。根据广场舞团队的主要活动开展情况，本研究将广场舞团队组织系统进一步细分为管理子系统、资源子系统、教学子系统和表演子系统。其中管理子系统主要涉及广场舞团队人员管理、目标管理；资源子系统主要涉及广场舞团队所拥有的内外部资源，既包括有形的设备资源，也包括无形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教学子系统主要由团队成员、团队舞蹈老师组成的子系统；表演子系统则是由广场舞团队日常表演和参加对外演出这一活动构成的子系统。

（三）公共文化自组织特征

1. 非平衡性

耗散结构理论中，自组织一大特点是“远离平衡态”，即系统内各要素分布是不平衡的，存在显著差异。开放系统与外界存在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外界物质、能量、信息输入超过系统容量阈值时，系统便会出现涨落，远离平衡态。广场舞团队的非平衡性主要体现在团队成员职责不同上，在每一个广场舞团队内部，团队成员发挥的作用、享有的权力、掌握的技能、甚至所处的位置皆有差异，

自组织的发起者作为通常意义上的领导者，在团队中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对团队成员的影响力远远高于其他成员，而掌握舞蹈等专业技能的舞蹈老师通过对团队成员培训来推动团队的发展。这些都是广场舞团队非平衡性的表现，广场舞团队的维系和发展依靠其系统内部的非平衡性。在非平衡态下，广场舞团队内部物质、能量、信息良性流动、协调，最终形成有效、良性运作的广场舞团队。

2.非线性

如果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则这两个变量属于线性关系，反之，则是非线性关系。自组织理论认为，系统中各要素或子系统间的非线性作用是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演化的根本机制。广场舞团队发展过程中要素间存在各种非线性关系，不同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这些要素既包括广场舞团队的资金、设备、物资等硬件条件，也包括团队的层级架构、管理范式、社会资本、团队成员、团队氛围等软件条件。广场舞团队内部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的相互作用很难通过线性关系来表示，而其相互作用引起的团队状态的变化更不是两者的简单叠加，而是复杂的累积过程，因而，广场舞团队的演化是非线性的。具体来看，非线性体现在团队成员之间的个性差异上，广场舞团队是由身份、背景、性格、习惯等皆不相同的人组成的团队，个人想法、意见、需求不可能完全一致，广场舞团队的发展受到人际关系、组织文化、组织发展等相互作用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曲折性等特点，导致广场舞团队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3.开放性

开放性是自组织系统实现物质、信息、能量交换的前提，也是维持系统稳定、完整的重要影响因素。任何一个自组织系统都不可能单纯依靠系统内部循环实现系统发展或效益增值。对于广场舞团队而言，广场舞团队因产生发展的地点、方式决定其必然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系统，需要其不断与外界进行人员、资源、信息的交换。广场舞团队的开放性，一方面表现在团队人员的流动，相对于其他组织，广场舞团队的人员流动性更大。在调查中也发现，仅在东方红广场上，不同的广场舞团队之间经常存在人员的相互流动，由于团队内部人员矛盾、人情关系、自身兴趣转变等都会引起广场舞团队内部人员的变动。与之相对的是，有队员离开，也会不断有新队员加入。新旧替换，构成了广场舞团队有序发展与演化进程。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广场舞团队和外界进行资源、信息的交换。发展较好的兰妹舞蹈队和锅庄舞团队恰是通过与其他地区舞蹈爱好者学习、交流，保持团队的开放性，维持团队整体不间断地输入-输出，实现团队新陈代谢，提高团队整体实力，应对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推动团队自身良好、稳定发展。可以说，开放性是发展完善的广场舞团队必须具备的特质，只有不断与外界进行技术和信息交流，才能保持广场舞团队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团队管理水平逐渐完善。

4. 涨落性

涨落指系统中变量对平均值的偏离。由于非平衡性和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涨落普遍存在于复杂系统中，并通过涨落机制，瓦解旧系统，催生新系统。广场舞团队的涨落就是其子系统以及要素对系统整体稳定性的偏离。具体来看，广场舞团队并非总能够平稳发展，还会遇到外界环境影响、内部成员离散、团队管理者管理失当等情况，这些都会导致广场舞团队在架构上出现变化，甚至导致团队分裂甚至消亡。由于广场舞团队的发展具有随机性，自愿性、自主性等特点，因而广场舞团队的涨落也是随机的。

二、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形成过程

（一）形成阶段：以兴趣为核心的团队组建过程

自组织的产生是自组织理论研究的重点。哈肯的协同学理论认为，组织内部要素的协同作用能够导致组织实现有序演化^[8]。那么，雨后春笋般的广场舞团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结合案例中三个广场舞团队形成的过程，可以发现，广场舞团队在发展中起因是创办者个人对舞蹈和表演的热爱，条件是有充裕的时间保障，对于舞种的个人偏好成为影响团队舞蹈类型的主要因素，在创建过程中，团队发起者主要基于信任和社会关系网络聚集在一起，并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以便更好组建团队，但是团队想要壮大，仍然需要积极主动吸纳新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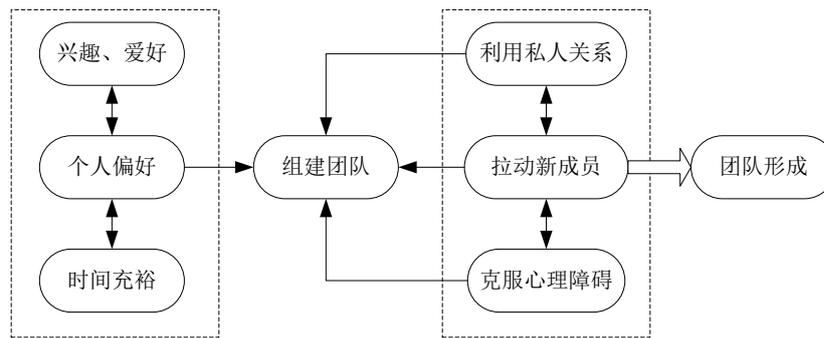


图 3-3 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形成阶段

（二）发展阶段：以“隐形契约”为核心的团队管理制度

自组织形成后，在管理模式和组织运行上会逐渐步入正轨，从组织程度低向组织程度高方向演进。在此阶段，管理者会根据团队发展需要，制定出一些相关管理制度，但是这些管理要求仅是“约定俗成”般存在，而没有形成纸质、规范化、常规化的管理制度。例如，在原本稳定团队成员基础上，会对新加入成员进行挑选，希望能够吸收优秀的人才进入自己的团队，以便团队能够获得更好发展；采取收费策略，向团队成员每月收取一定费用，以便组织的正常运行；组织团队舞蹈骨干外出培训，进而提升团队整体实力等。此时，广场舞团队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便是管理规范的确立、保持团队对外开放、获取团队发展资源以及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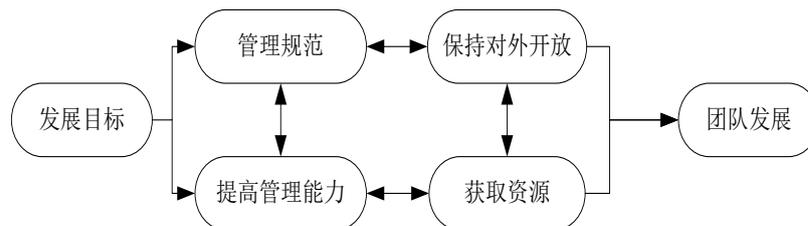


图 3-4 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发展阶段

（三）平稳阶段：以“常态化”运作为核心的团队发展过程

这一阶段，广场舞团队经历过了变动较大的形成阶段和发展阶段，管理者的团队管理经验和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团队运行常规化，成员趋于稳定，团队气氛比较和谐，团队步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实现了从组织程度低向组织程度高的转化。这一阶段团队主要表现出来的特征有：一是组织化程度相对比较规范，广

场舞团队产生稳定的管理人员和执行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制定的团队管理规范要求，对团队的管理以日常管理为主，较少发生意外事件；二是团队规模相对稳定，这一阶段管理者和队员都处于稳定状态，很少发生较大变动。在稳定阶段，广场舞团队的核心事项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维持团队的正常运作，团队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对外沟通机制和内部教学模式，团队发展趋于稳定。二是实现团队提升，在稳定阶段，逐步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加强对细节的管理，实现精细化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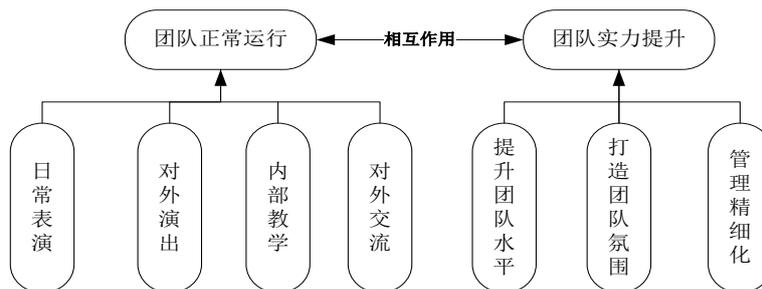


图 3-5 公共文化自组织的稳定阶段

（四）衰落阶段：以组织“突变”为核心的团队解散过程

自发形成的广场舞团队，除少数能够得到企业赞助或政府资助以外，多数是自我管理，自负成本，在团队运行中，一些管理能力、凝聚能力、生存能力等较弱的广场舞团队容易遭遇“突变”危机，面临人员流散，团队衰竭，最终消失的结局。处于衰落阶段的自组织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管理者在团队中影响力减小，管理者个人魅力是影响团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衰落阶段，广场舞团队的管理者个人魅力下降，对团队的管理能力和影响能力下降；二是团队成员对团队缺乏依赖性；三是成员流失程度较高，如前文所述，人员是构成团队活动的支撑，成员流失是团队重大损失。上述任何一种情况的出现，都需要管理者提高警惕，及时改变管理方式和管理策略，提高团队的优势和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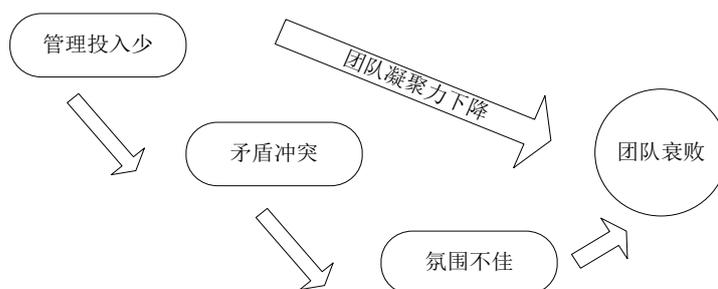


图 3-6 公共文化自组织的衰落阶段

三、公共文化自组织发展的动力因素

自组织发展是自组织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协同理论认为，自组织依靠系统内部的竞争、协同作用实现发展，并通过竞争走向协同，协同后又会出现新一轮的竞争，就这样通过不断地竞争、协同作用，推动自组织不断发展。在公共文化自组织团队发展过程中，正是受到竞争与协同相互作用，推动团队朝完善和规范方向发展，实现团队从无序到有序，从组织程度低到组织程度高方向发展。

（一）竞争：公共文化自组织发展的前提

“凡通过某种斗争而促使系统演化的活动，都是竞争。”^[9]哈肯指出，竞争一方面造就了系统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条件，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系统有序结构的演进^[10]。在自组织系统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无处不在。主要表现为团队保持开放性、非平衡性发展，保持团队内部和外界能够不断获得信息、物质、能量等资源的交换，从而维持团队活力，提高团队管理能力和管理规范。以外部环境为例，活动场地的大小直接影响团队发展规模，一个拥有较大互动场所的自组织团队往往能够吸纳更多的团队成员。人员是文化自组织团队存在的基础，也是其能够有序开展活动的保障。人员增多，意味着团队中有更大的概率产生优秀人才，该文化自组织团队也因此有更大的机会脱颖而出，成为一个领域的领军者。因而，竞争使得文化自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会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自我优化，以期获得更多资源、机会等。在竞争中，更重要的是，文化自组织团队能够通过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争取吸引更多的成员参与，通过自我优化实现团队有序化的发展。

（二）协同：公共文化自组织发展的保障

单纯依靠竞争作用，系统无法维持自组织的运转过程，只有在竞争基础上的协同作用，才会导致系统自组织的产生、发展，并实现整体功能的优化。哈肯认为，协同是系统中各子系统间的联合作用，各子系统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协同效应，从而使系统在时间、空间上达到有序结构。公共文化自组织团队内部的协同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团队目标、管理制度、团队资源等子系统的协同作用。系统中每个因素既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又要配合系统的整体发展。一个团队中不

可能保证每一个成员都能承担最想要的职责，因此必然会出现内部的协调，这一过程就是团队内部的协同机制在发挥作用。协同作用既表现为团队内部各成员之间相互协调、配合、相互促进，形成团队内部的有序结构，协同作用既重视成员能力、资源、素质等方面，又表现在团队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作用。

自组织的协同意味着系统在竞争中协同发展，系统中每一个影响因素不可能独立发展，必然要与其他因素在合作与竞争中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协同。协同对组织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直接实现协同，另一方面则通过因素间相互作用，驱逐系统内部不协同的因素而实现系统协同。通过协同，实现了系统内部整体的有序，提高系统整体性能。

（三）基于动力要素的公共文化自组织发展全过程

在文化自组织不同发展阶段中，文化自组织内部各种要素通过竞争、协同等作用交叉产生影响，推动组织由无序向有序状态发展，也是因为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组织内部原本的有序状态被破坏，最终重新归为混沌态。在不同发展阶段，公共文化自组织的行动策略各异。在形成阶段，公共文化自组织倾向于建立组织内部的管理层和发展新成员；在发展阶段，组织管理者更倾向于提高组织内部管理，保证组织能够获取发展资源和建立明确的管理规范；在稳定阶段，公共文化自组织只需要维持原有运作模式，并逐渐完善组织的管理细节，实现组织的稳定发展；在衰落阶段，当面临组织内部人心涣散，组织成员出走等问题时，组织管理者未能实现对组织的有效管理，最终导致组织的分裂和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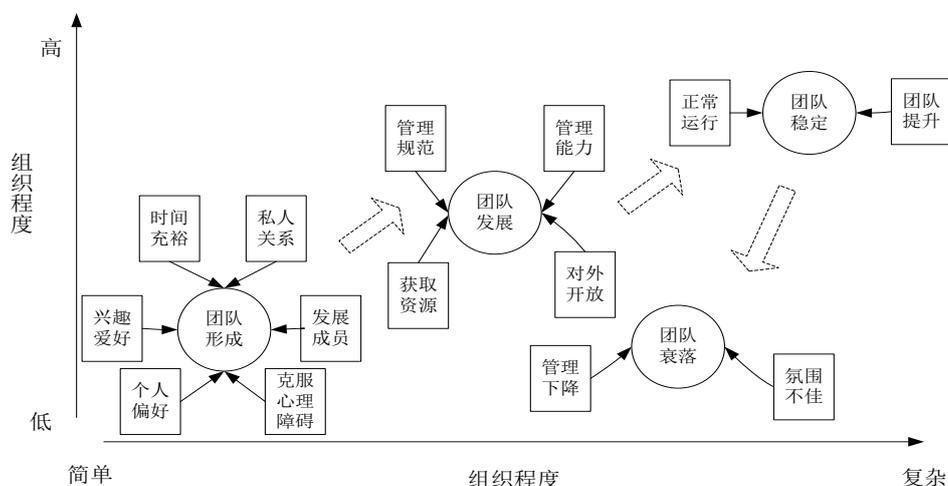


图 3-7 公共文化自组织发展路径图

第四章 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

本章在对自组织这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载体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生发逻辑”主要是为了表明事物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所遵循的基本规律,是指事物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内在机理。经过对实际调研中所获的样本数据¹进行编码分析,可以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概括为“文化需求衍生”“社会条件进步”“文化团队组建”“文化空间整合”“社会资本积累”“情感价值回归”六大主范畴。需要说明的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并不严格划分为“生成”与“发展”两部分,二者并无清晰边界,也即生成内有发展,发展内有新的生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是一个互相包含、互为融合的整体。

一、文化需求衍生——自主供给的逻辑起点

(一) 主观爱好与健康意识的彰显

兰州市各类自发组织的文化团体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最初只是一些退休妇女为打发时间,选择凉风习习的傍晚在小区空地上跳舞。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健康观念的转变,原本目的单一的广场舞逐渐拓展为以满足个人爱好、塑造健康体魄为初衷的文化活动。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物质基础完全满足生活需要的前提下,人们的注意力则会转向更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尤其是中老年人退休后,无需再为生活奔波操劳,从一种忙忙碌碌的快节奏生活状态突然转换为无所事事的慢节奏生活状态,不自觉的会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加之儿女大多成家立业忙于工作和生活,无形之间也会产生焦虑与落寞的心理情绪,因此,老年人渴望在平静的生活中寻找一些生活调味品。于是他们便三五成群地加入各类文化团队中,共同在文化活动中寻求心灵的满足和精神的慰藉。

¹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楼兰之韵新疆舞蹈队、锅庄舞蹈队、夕阳红老年合唱团和谐秦腔自乐班的调研资料,编码代号分别为XJ、GZ、XY、QQ。

健康意识在快速发展的物质时代已经深深嵌入人们的头脑中。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6岁^[11],然而处于社会转型期,高额的生活成本,激烈的竞争压力,让不少人长期处于身心俱疲的生活状态中,消耗健康,已经成为很多人奋斗的代价。老年人在享受晚年生活的过程中,对物质需求看得更为寡淡,相反则更加注重身体状况是否良好,而中青年人则有意识的提前规避生活压力带来的健康损耗,越来越多地走出家门参与文化活动。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免费的自发性文化娱乐活动也就成为了不同群体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完美选择。

表 4-1 “主观爱好”与“健康意识”的编码举例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主观爱好	PG39 我喜欢太极拳,打了二十多年了,看这有人打太极拳,我都会跟上一 起打（主观兴趣） GZ61 只能说是爱好,我对藏族的锅庄舞是情有独钟,我以前在部队上待 过,跟藏民打过交道,藏民的生活习惯各个方面我都了解（生活经历） QQ179 周末了休息了就出来唱唱秦腔,主要是喜欢这个东西（兴趣所致） XY167 我唱了十几年了,早上和下午都唱,就是喜欢唱歌（兴趣浓烈）
健康意识	XY53 关键还是以锻炼身体为主,人的观念在变化（健康意识）(观念转变) XY168 唱个歌对身体好（注重健康） XJ57 现在人们都比较注重健康和娱乐,注重保养（健康意识增强） QQ292 就是为了领着大家一起开心、快乐地锻炼身体,为了健康着想, 没有别的目的,很简单（健康意识）（活动目的）

（二）观念认知转变

时代的快速流动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外表的更新换代,也催化着民众内心的观念转变。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里,群众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个人价值导向越来越明显,人们已经从过去简单的政治动员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而变成积极地参与者,这一点也在文化娱乐方面得到显著证实。在市场经济阶段初期,人们的生活重心停留在生产生活方面,处于一种经济被动状态,虽然物质条件的改善日新月异,但是总体上看,经济圈层对人们主体性观念的束缚依然沉重,社会分层、社区分化以及日渐疏离的原子化个体都成为人们价值观现代化塑造的阻碍因素。近年来,尤其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总目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逐渐将重视人的主体性构建、完善

社会多元治理机制的议题植入人心。从价值角度看，现代化就是各个层面的理性增长^[12]。一方面，在愈发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持续性增长，突破了物质条件的压力，人们更多地向往轻松愉悦的精神享受，不再像过去那般封闭保守，渴望得到展示自我的机会。群众不仅仅是文化活动的观赏者，也应该是参与者，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文化活力。另一方面，源于时代变化莫测和网络工具的飞速转换，个人精神的解放已经不再是大多数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歌舞表演也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原本喜爱文化活动的人们可以尽情释放天性，在开放宽松的氛围中将个人爱好充分展示出来。当获得队友或是旁观者的赞誉时，便会激发他们的表演热情。因此观念认知的转变是基层群众自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在逻辑起点之一。

表 4-2 “认知观念转变”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观念认知转变	PG70 人的思想各个方面也都开化了（思想开化） XJ73 过去人的思想太封闭了，现在慢慢就开放了（思想逐渐开放） XY51 年轻人都随便可以唱首歌，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呢？社会这么好，应该多出来活动活动，干嘛老是憋在家里（认知不同） QQ151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人老但是心不老（心态年轻） XY16 过去人们都比较保守，即使爱唱也不好意思唱，现在不像以前，大家想唱就唱，也没什么的，主要是观念转变了（观念转变）

（三）历史记忆与心理情愫的唤起

基层群众公共文化自主供给表面上是一群人的自娱自乐，实质上隐含着民众内心深处的某种难忘情结或深刻记忆，这种记忆情愫的东西印刻在时间的痕迹里，依托生活的影像而代入一种文化娱乐中。例如，秦腔曾是风靡西北地区，尤其以陕西和甘肃一带主要发展地域的古老戏曲，而如今会唱秦腔的人也步入花甲之年，他们从昔日熟悉的农村生活转移到生疏冷漠的城市，难免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感，而秦腔作为一种联合过去记忆的纽带便成为城市角落的一种记忆重现。红歌演唱则更能代表一种革命情怀和对现在美好生活珍视的厚重情感，随着城市的发展轨迹，这种文化传统变为一种“城市记忆”。城市记忆的延续，不但是对地方历史文脉的保护，更是对城市自身发展轨迹的展示^[13]。无论是历史记忆，还是民族情结，都在时间的催化中演变成为一种心理情愫，在互相熟知的群体中

搭建起相似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重组文化喜好，并通过多样的形式表达出来，成为历史记忆直接而独特的展现方式。

表 4-3 “历史记忆与心里情愫”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历史记忆 心里情愫	QQ31 因为一般老年人怀旧，秦腔他听得亲切，听得懂（怀旧情结） GZ62 藏民的朝拜让我感动，因为人家有信仰，他们为了美好的生活，都要祈祷，尤其是藏民这种执着的精神让我很感动，所以我就跳锅庄舞的（深受感动）（民族情结） XY217 我们都是岁数大一点的中老年群体，我们是唱的红歌多一点，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唱的是这些歌曲，就是觉得比其他歌曲都好听（心理情愫）（历史记忆） QQ280 我小时候没什么玩的，唯一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村子里唱戏，特热闹（怀念过去）（历史记忆）

二、社会条件进步——自主供给的外在支持

（一）社会形态的微观变换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例如秦腔自乐班、腰鼓队、花儿演唱等很多文化团体的主要组成人员都是近年来从兰州市周边的农村转移而来，或是进城务工，或是随儿女进城养老，他们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兰州市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形态，因此成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微观变换，这种变换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具体表现为三方面：第一，主要供给者——以城市居民为的主要参与者变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结合的供给结构；第二，文化资源形态——在城市原本单一的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增添了农村地区的文化元素，如秦腔、花儿、腰鼓等；第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客体——因为文化资源的多样性的丰富，增加了其他居民活动的可能性，使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群众基础更为广泛。

实际上，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城乡关系演变而形成的社会形态。从城乡二元关系的视角出发，社会形态是城市和农村在合作、冲突或互动的形塑过程，它反映了城乡发展中的博弈过程的外部样态^[14]。社会形态作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外在表现，是社会经济与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与社会活动这二者同时构成的社会模式，而基层公共文化自主供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不断变换的社会形态。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地级市只有98个，而

2016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297个，同一时间内，城镇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数从17.92%增长到57.35%^[15]，地级市数量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数比重增长均超过三倍，可以清晰的印证了中国经历了一个城市崛起而农村缩减的过程。基于近年来的征地拆迁、撤村建居的背景，城市化对农村空间形成挤压态势，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客观上决定了城市对农民工的刚性需求。所以，城市的崛起的同时伴随着与农村的消逝，导致了社会形态在外显维度上的变化。与此同时，诸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认知观念以及文化认同等内在观念也随着社会外部形态的变化而变化。这些观念随着城市社会的兴起逐渐被民众所接受，成为社会形态更迭的内在力量。

社会形态演替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其最鲜明的表征就是城乡差距下的个人理性选择。在城乡关系博弈中，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使得农民在个体选择中更加趋向于的城市化^[16]。部分农民群体已渐次移入城市，或基于农村人口减少的冷清，或基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公共设施、社会服务等存在匮乏，更倾向于选择经济水平较好的城市度过晚年生活。他们在流入地通过文化性的社会交往得到了一定的社会支持，推进了城市认同感的获得，从而能够在流入地建立人际关系和行动网络^[17]。总之，他们的进入催化了城市社会形态的演化，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可以说，社会形态的更迭变换是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最为宏观的外部支持。

表 4-4 “社会形态更迭”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社会形态更迭	<p>PG29 我原先在农村，过去的人逢年过节的都唱一唱（秦腔），现在也不咋唱了，来这（城市）之后呢，反而还看到有人唱呢（从农村到城市）</p> <p>QQ55 我们都是一起来打工的，周末闲了就聚到一起唱上几个小时，一开始还不好意思唱，周围这么多人看着呢，后来唱多了也就没那么多顾虑了（进城务工）（心态放开）</p> <p>XJ101 我老家是陕北农村的，跟着儿子住到这边（城市）来了，平时没事干时候就跟着跳跳舞，我觉得还挺充实的，城里的人都挺能放的开，我慢慢也跟着放开了（进城养老）（思维方式的转变）</p> <p>XY219 老家在农村呢，但是几年前就拆迁掉了，好多人都慢慢搬到城里来了（农村房屋拆迁）</p> <p>QQ188 我孩子在城里上班呢，我就来帮着带带孙子，早上把娃娃送走了（上学），我就来公园里跟着唱歌（移民进城）</p>

（二）文化政策与制度支持

公共文化政策的落实是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责履行的集中表现。基层公共文化的逐年兴盛离不开文化政策和制度的大力支撑。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方面，兰州市积极响应国家战略的号召，于 2016 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建设主体，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激发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不仅如此，兰州市各县区也积极推出了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建设“兰州市文化圈”的建设主线，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最为重要之处在于，2016 年兰州市“群众自发文艺团队建设机制”被文化部、财政部确定为第一批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后，市政府随即借政策之力顺势而为，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群众自发文艺团队建设机制的意见》，每年安排 100 万元用于扶持群众自发文艺团队演出^[18]。此外，政府还采用以奖代补、项目补贴、演出资助和招标采购等办法，对文化惠民及各类公益性演出予以补贴，扶持基层群众业余文艺团队发展，并逐步形成了“文化活动月”、“文化艺术节”等群众文化活动品牌，为广大群众的文化活动提供良好的展示机会。

政策支持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与完善打了一剂强心针。无论是兴修街道、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的硬件支持，还是政府提供演出机会和经费奖励的软件支持上，这些实践的落实无疑拉近了以往空有说辞的“政策鸿沟”，给予了群众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成为促进群众自发性文化团体成长的又一有力的外部条件。

表 4-5 “文化政策支持”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文化政策支持	<p>XJ89 现在社会进步了，政府也更加重视文化的发展了（政府重视）</p> <p>QQ150 这两年政策支持力度比较大，听说逢年过节要是参加演出的演还有演出经费和奖励呢（经费支持）</p> <p>PG78 这两年明显的能看到政府给咱们老百姓修的那些个文化活动室啊之类的，说明政府还是支持文化这一块的（硬件支持）（政府支持）</p> <p>GZ258 我们团队过年的时候参加市里的广场舞比赛，我们人多又跳的好，最后拿了个团体赛第一名，得了两万块钱的奖金呢（比赛奖励）</p> <p>XY262 现在的政府越来越重视居民的文化生活了，都想着怎样提高一下，所以给了我们很大的便利，要是有什么比赛之类的，基本上大部分都能拿到奖金，这就是一种激励（政府激励）</p>

(三) 生活质量改善与参与成本反向行之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心理需求，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需要、尊重需要到最高级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折射了人之所需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化过程，而这样的演化过程无疑是依托于社会经济发展而实现的。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文化诉求正在成为当下更大的激励性动力^[19]。当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某一基点时，便会出现追求文化品质和精神享受，同时又能够实现自身价值的深层次诉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也正是在物质条件大丰富后出现的更加具有主动意识和主体价值的供给模式。一方面，经济发展推动人民有更高层面的精神文化诉求，需要个人尊重感和个人感的提升，同时也更加注重主体价值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很明显地渗透在了群众自发性的文化娱乐活动中。群众在参与性决策中、事务性管理中、群体性协商中寻找个人定位，在自我管理中彰显乐于助人的精神典范，形成了从尊重需要到自我实现需要的过渡阶段，完成了“价值空置”到“价值落地”的转换。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不仅仅体现在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也体现在生活成本的降低，尤其在以移动互联网为主的科技时代，群众可以借助便捷的网络渠道进行学习，主要体现在视频学习、歌曲下载等方面，这也促进了群众依照自身兴趣进行借鉴和学习过程。可以说。生活水平的提升推进了群众树立自身价值的精神欲望，参与成本的低廉和便捷又助推了群众自组织的良态发展，二者反向行之构成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得以发展的客观条件。

表 4-6 “生活条件改善”与“参与成本低廉”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生活质量改善	PG284 现在的人生活条件好了，闲暇时间也多了，需要精神享受（条件好转） XJ77 现在的日子也富裕了，社会好了，生活也好了（生活富裕）（社会进步） QQ98 过去老是生活奔波，太忙了，现在有时间了，生活也富裕了，不用再为钱的事情操心了（时间空闲）（生活富裕） PG7 关键就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有这个闲情逸致来搞搞这些活动（生活水平提高）
参与成本低廉	XY146 老年人都退休了没事干，所以都有时间，来这里自娱自乐，怎么美怎么来（时间成本） XY155 我们一个月只交十块钱电费，很便宜的，谁都能交得起啊（参与成本） GZ158 我现在还在上班，只能周末来跳跳锅庄舞，但是现在公园这么多，都不用坐车，走路就能到（交通成本） GZ313 平时跳舞的服装都是自己准备的，一套也就 100 块钱，网上买的，也不贵（服装成本） PG198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不会跳了可以从网上学呀，现在人人都有手机，下载个视频看着学，也不用专门花钱去学，还是挺方便的（学习成本）

三、文化团队组建——自主供给的载体构建

由群众自发组建起来的文化团队既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过程，也是团队成员由内部整合向外部拓展的“外圈过程”，经过三级编码后发现，文化团队的组建由五个阶段构成，分别是“文化精英的引领示范”“陌生成员的浸入体验”“团队成员的认同吸纳”“团队成员的凝聚共融”以及“团队品牌的内涵塑造”，以上五个范畴可简化地表述为“搭建-体验-进入-共融-共建”的团队组建机制。

（一）雏形搭建：文化精英的引领示范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以各类文化团队为主要载体，在文化团队组建过程中，少不了文化精英的引领示范作用。“精英”是指精明强干、具有显著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群体，在文化领域内，如果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源，并能有效地利用，服务于大众群体，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赞许的人，则被称之为“文化精英”。在文化团队形成伊始，少数几位文化精英人士对于文化团队的雏形搭建起着领导作用。这些文化精英主要由“文化爱好者”和“专业人员”两种类型组成。文化爱好者一般基于长久以来保持的浓厚兴趣，加之在生活中能够历练积累的文化才能，从而产生组建文化团队的意向。另外，文化团队的雏形搭建不乏专业人才的助推，比如团队多有专业艺术老师、学校的退休教师、民间艺人和少数民族群众等为主要人才代表，他们通常掌握着高尚的艺术审美和纯熟的经验技术，能够对普通群众产生指导作用，引领集体性文化活动沿着培养高尚情趣、塑造艺术气息的轨道前行，避免了活动的单调和低俗。此外，能够充当团队带头人角色的文化精英通常都有着较为出众的领导才能，主要体现为团队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关系管理能力。总体来说，文化精英在团队搭建过程中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他们在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成为文化主体的内在张力，不仅具备了良好的感召力，还能够引领大众的文化自觉性。因此，文化精英的存在是文化团队得以形成的核心力量。

表 4-7 “文化精英”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文化精英	<p>QQ188 团队成员在退休之前大多是从从事专业的戏曲工作的，有音乐学院的老师，有音乐系毕业的，还有秦腔团团长（成员专业性）（人才资源）</p> <p>XJ18 我们有专业的舞蹈老师，她本身就是维族人，年轻时候就在舞蹈团待过（个人资源）（技术纯熟）</p> <p>XJ236 我们队长年轻时就是单位的领导干部，她有那个管理意识和思维（管理才能）</p> <p>XY300 老张、老杨原先在文化团待过，而且也当过中学的音乐老师，人家那唱功好的不得了（音乐功底）</p> <p>GZ349 一方面我是一直都喜欢跳舞，年轻时当过县里的舞蹈团的小组长，我排过几个正式的台舞，算是有点经验，所以组建这个团队也就自然而然的起来了，啥事都是有点经验就好办了（舞蹈功底）（管理经验）</p> <p>PG11 这些人（活动者）本身就是靠自身资源参加的，他们都唱了几十年了（经验丰富）</p>

（二）身临其境：陌生成员的浸入体验

当文化团队的雏形搭建起来后，便是新成员不断进入的阶段，人员的不断加入成为文化团队的重要构件。在团队组建过程中，第一步源于初始微型团队的魅力散发。当文化团队在广场或公园在公共地带开展自发性文体活动时，往往会吸引感兴趣的来往行人驻足观看，这个吸引点或是优美的音乐，或是动人的舞姿、或是高亢的歌声、或是唱念做打的戏曲。此时文化团队成了“表演者”，过往行人成了“旁观者”，他们往往表现出跃跃欲试的心理状态，甚至会在旁观者人群中不由自主的跟唱或跟舞，进入了一种“身临其境”的表演场域。文化团队因其自发性的组建、发展方式，必然具备了“开放而非封闭”的特征，也即文化团队并无明确的“准入界限”和“准入规则”。在这种情境下，文化团队为了增加团队成员数量、扩大团队规模，往往以热情接纳的姿态欢迎“旁观者”进入组织尝试，于是陌生成员能在备受鼓舞的氛围下形成一种“浸入体验”环节，有正式成员的“帮帮唱”或是鼓励，旁观者也能够逐渐放松心情，愉快地暂时融入该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因文化团队的自组织保持的“开放性”特征，虽无“准入条件”，但也无“准出限制”，因此陌生成员可以即时性地加入某一团队，也可即时退出，形成了一种灵活无限制的“进入-退出”机制，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安排和兴趣喜好，即时地加入一个以上的文化团队。使公共文化自组织形成了能够灵活应对外界变化、交换人员与资源的发展机制，整体上助推了团队的自由发展。

表 4-8 “身临其境”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身临其境	GZ247 如果有观众想学的话就直接进来了，比较随意的，随便进来体验体验嘛（体验环节） XY248 爱好者来唱都是欢迎他们的，所以后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欢迎态度） QQ220 我们谁愿意唱都可以，有些农村老太太们来了，唱也就唱了（开放性参与） XJ258 我们一开始就是在旁边站着看着，看多了也想进去和他们一起跳（驻足观看）（跃跃欲试） GZ288 我们没有说让你进或者不让你进，你要想跳，你就直接加入进来，毕竟我们都希望团队人数多一点多才好，这样氛围就能起来了（直接进入）

（三）关系嵌入：文化团队的认同吸纳

“嵌入”一词意为一个系统有机结合进另一个系统之中的客观现象^[20]。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以新经济社会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创性地提出“嵌入性”概念^[21]，此后，“嵌入性理论”更加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结构域社会关系的问题域中。进入文化团队的微观视角，不难发现，群众自发性组织的不断扩大有着“组织认同吸纳，个人关系嵌入”的必然环节。团队的成立和发展乃至壮大表面上是新成员的不断加入，实则是成员关系的“实质性嵌入”。当团队周围的陌生成员经过“浸入式体验”环节后，往往有很多人愿意加入其中。此时，文化团队以开放欢迎的姿态，以非正式方式接纳新成员，经过不断地磨合和交流拉近成员关系。当新旧成员互相熟悉之后就逐渐形成了文化团队的“身份认同”“关系认同”“价值认同”，此时，以新成员为嵌入的主体，以现有文化团队为嵌入客体，以个人资源、关系、价值观等为嵌入的主要内容的“吸纳-嵌入”机制就成为促进自发性文化团队提升扩容度的第三步骤。

表 4-9 “关系嵌入”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关系嵌入	QQ247 有人想学习这个，就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中来，我们就一起教着唱（成员互助） PG216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热情的，不排外，谁想进入都可以的（成员吸纳） XJ125 有的人一开始就是进来试试，也不咋会跳，时间长了呢，他经常来跳，我们也就熟悉了，我们就把他看做是我们的成员了（互相熟络） GZ312 他们有的人体验完了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加入进来，还能拉着她的朋友一起来，我们都很欢迎的，毕竟我们也要慢慢壮大这个队伍呢（输入人脉资源）

（四）情感共鸣：团队成员的凝聚共融

当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处于同一情境下，他人的情感变化能够引起个体主观相同或相似的反应倾向时，就产生了“情感共鸣”。对一个群体或团队来说，情感共鸣展现的是内部成员共同的“心理振幅”。当新成员加入某一团队中，客观上将其个人文化偏好、价值观念、行为意识等要素嵌入进组织中，在时间的不断积累中，成员消除了彼此的陌生感和隔阂感，更具有有一种零距离、直面化的交流互动。与此同时，以常态化的活动、赛事为具体事件节点，无形之中成为了组织成员的情感粘合剂。以楼兰之韵新疆舞蹈队为例，该团队自成立以来以鲜活的民族风情为主的舞蹈特点而受邀于各种大小演出和比赛。在团队成员众多的情况下，舞蹈排练、音乐选取、组织管理、非正式制度建立等方面都需要成员的共同商议决策，虽然不否认有时会出现个人意见相左的情况，但是在人人参与的机制下，各成员都以“促进团队”为最终目标，因此，成员之间的沟通、互助、学习便成为情感的“输入-输出”过程，同时也成为一种“建设性的情感共鸣”^[22]。这其中就源于团队成员长期以来通过磨合、沟通、交流的方式而达成的心照不宣的心理机制，从而逐步转化成一个团队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在某一程度上又形成了成员的“心理参照”，使得团队成员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都逐渐接近，趋于同一，进而以“共同参与-心理参照-情感共鸣-团队凝聚”的逻辑走向牢牢粘合了团队关系。

纵观这一发展逻辑，无论是成员的个性展现，亦或是团队发展的整体走向，都离不开内部成员微妙的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共鸣在其中起到了极为显著的凝聚作用，是促进群众产生共融心理、保持团队长久发展的直接动力。

表 4-10 “情感共鸣”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情感共鸣	<p>XY201 在这个团队中，既能自娱自乐，大家互相帮助，演唱技巧也提高了（成员相互促进）</p> <p>XY324 哪怕就是每个人十块钱、五块钱的，设备既然是大家用就大家来分摊，不要一个人掏钱，这样不公平，不能叫我们师傅一个人掏钱（互相理解）（团队氛围和谐）</p> <p>QQ289 玩这个的都是爱好才走到一起的，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大家互相商量商量，也关照一下彼此的意见和看法，久而久之我们成员之间都变得挺谦和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团队该有的素质（互相商量）（心态谦和）</p> <p>QQ291 有些事情要和大家一起商量，这都是互相的，人际关系比较和谐，这样才能把这个队伍壮大起来（共同商量）（人际和谐）</p> <p>XJ290 我应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遇到困难也要自己首先要大度，宽容还要肯吃苦，大家才能听你的（身先士卒）（宽容大度）（表率作用）</p>

（五）形象价值：团队品牌的内涵塑造

“形象”是能够引起人的某种情感活动的外在姿态，“价值”是人们对客体关系的认知结果，包含着观念、态度、信念等要素。“形象价值”则意味由形象带来的效益，因为形象本身具有价值。形象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是形象的内部承载。在文化团队中“形象价值”往往扮演了一种品牌的外显性展示，不仅在于团队形象，也在于其品牌内涵。如“楼兰之韵新疆舞蹈队”，其名取“西域楼兰之风韵”的美意，以穿戴维吾尔族特色服装为标志，清晰地展示了团队风情浓郁的新疆特色，在文化活动现场极为引人注目，成功地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品牌形象。“和谐秦腔自乐班”的核心内涵在于“和谐”二字，该团队成员大多是从兰州市周边农村而来的农民工，因相同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目标聚在一起，因此选取了“互助合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和谐之意，为团队发展寄予美好希望。与此相同，很多自发性文化团队在发展过程中都为自己取名，一些较为成熟的团队还身穿统一服装，策划团队口号，制定非正式制度等等，从而在形式上树立一种鲜明的团队品牌，使得团队更加具有正式性，也增添了团队的形象价值，并达到一定的宣传目的。因此，品牌形象是群众自组织文化团队持续发展的保障因素，它不仅呈现着团队正式化的形象，也塑造着深刻的价值内涵，是文化团队组建的高阶目标。

表 4-11 “形象价值”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试概念）
形象价值	XY228 咱们把我们的团队叫做“夕阳红歌唱团”，慢慢我们要把队伍组织组织起来呢（团队品牌）（团队目标）
	QQ184 名字呢，就是“和谐秦腔自乐班”，因为我们都是从农村来打工的，好不容易能聚到一起唱秦腔，我们都挺珍惜的，希望我们的队员一直和和谐谐的（团队名称）
	GX139 我们就叫“滚雪开心舞蹈队”，这个名字是有寓意的，意思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可以让我们的队伍发扬光大（名称寓意）
	XJ251 因为我们跳的是新疆舞，我觉得穿上新疆的服装，不管男的女的，都特别能展示我们的风采，看起来比较正式。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看我们的服装就能知道我们跳的是新疆舞，时间长了其实也有一种宣传作用（统一外在形象）（宣传作用）

基层群众自发组建的文化团体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必要载体支撑，它具备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共同的目标和使命——团队成员在实际行动过程中，必须达成一定的共识或是心理契约，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才能使文化团队持续发展。二是民间性——不是由官方机构组建起来的团队，而是由群众基于群体意愿自发组建，它不具有正式边界，也不具有正式制度，成员进出自由，团队内部事务完全由集体意见所决定。三是非盈利性——文化团队组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共同的文化需求，并不涉及利益，这也是民间文化团队容易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文化团队的构建使得群众文化活动有了一个特定组织，不仅有利于促进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交流，也有利于构建生活空间，从而推动认同感、归属感、心理安全感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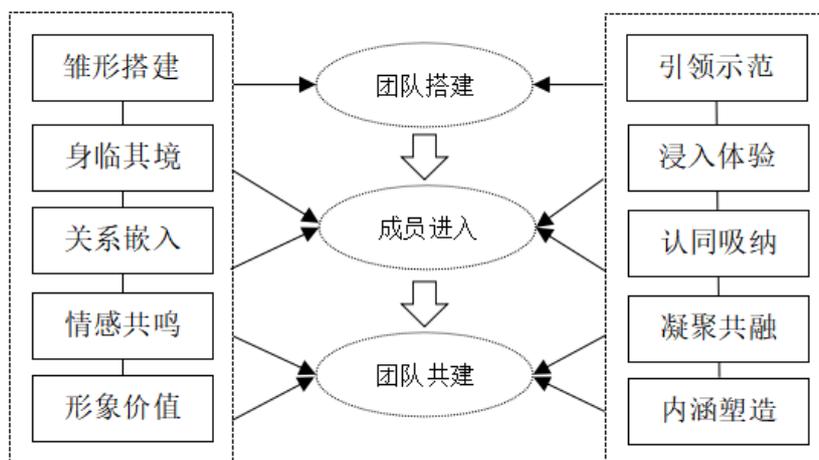


图 4-1 文化团队构建的逻辑关系图

四、文化空间整合——自主供给的情境叠加

城市文化空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土壤。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趋于完善,公共文化空间功能价值日益凸显,文化建设逐步呈现出空间转向的趋势^[23]。日本著名学者加藤晃曾言:“都市需要一座发挥整合功能的空间”。^[24]现代化的都市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聚合,它需要一个社交中心。显然,城市公共空间除了固有的物理属性,更需要的是维系社会交往的环境机制。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机制不仅造就了一个公共文化空间,也发挥着城市关系的整合与互动作用,文化空间整合成为了居民参与基层公共文化自主供给的情景叠加。本研究经过编码得到了“物理场所”“文化资源”“娱乐氛围”“文化与情感互溶”四个主范畴,在公共文化空间分别扮演着硬件支持、软件支持、环境机制与心理机制的角色。

(一) 硬件支持:物理场所的基础性供给

“空间”是一个包含多元意义的复杂概念,物理学上将空间定义为与时间相对的具有三维立体性的存在形式。聚焦于社会学视域下的文化空间,则是指具有文化意义的物理空间、地点、场所^[25]。无疑,文化空间首先是一个物理场所的客观存在。城市居民在进行自发性文化活动前,首先要选定一个合适的场所作为活动地点,通常以人民广场、文化广场、公园、社区活动中心,或是具有大面积空地作为选择对象。这些场所通常都具有“开放性”、“无门槛”的特点,不需要缴纳场地使用费,不被限制活动时间,且都设在居民生活圈中心,具有交通便利、活动场所向四面辐射的优点,因而是群众开展公共文化活动最佳选择场所。团队组织的空间选择通常具有随意性和临时固定性,也即团队成员并不将活动位置长期固定在某一领域,场所的选择大多以人口流动性、活动密集程度、空间开放程度等作为定位标准,若固有场地产生了资源争夺的情况或是能够寻找到新的场地,那么成员能够在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更换活动位置,因此组织场域具有空间流动性。同时,源于公共场所的聚合功能,公共活动场所扮演着“人口集散地”的重要角色,能够承载大批量群众的同时活动。旁观者在享受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的同时,更能催生他们产生跃跃欲试的从众心理。因此,实体环境通过文化景观、基础设施等能够激发市民参与其中的欲望,从而吸引更多群众踊跃参与其中。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出台，国家大力提倡建立健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以满足群众的文化诉求，各“文化圈”、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的修建都为群众提供了便利的活动场地，这些物理场所成为群众自娱自乐的硬件支持，也是创生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及其社会关系的前提。

表 4-12 “物理场所”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物理场所	PG78 在公园开展这样一些文化活动好的很，不像小区，人少的很，聚不起来，公园人多，大家能跳起来（场合优势）
	PG84 这里环境好，游人多，主要是地方宽敞（环境优势）
	XY56 像公园这样的一个场地实际上是给活动挺了一个很大的便利，相比自己家的小区要更好一点，因为离居住区远一点，也不扰民，所以我觉得这个场所非常适合文化活动(场地便利)
	GZ114 如今，各种文化场地多得很，成了我们老百姓就近开展文化活动的舞台（场所便利）
	XJ303 这个广场因为离家近一点，主要是方便（就近活动）

（二）软件支持：文化资源的补给性填充

同自然资源一样，文化资源也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资源，通常是精神性消耗品，包括精神产品或活动、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文化资源是群众满足自我文化需求的“精神食粮”。随着多年来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愈加丰富，多样文化资源的注入使得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以广场舞为例，广场舞因其大众化、平民化的特点曾经一度成为风靡社会的娱乐活动，尤其以退休的大妈为主要参与群体，迅速在全国的各大广场上扩张开来，但是广场舞也曾经被贴上了“低俗化”的负面标签，究其根本，是源于广场舞内容的“空虚化”“单一化”，缺少鲜明的文化特色，处于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之中，文化资源的匮乏一度成为广场舞的发展瓶颈。

近年来，随着人口迁移、社会形态变换、现代信息技术的覆盖，文化资源呈现出了重生态势，一些特色文化因子流入城市，为原本单一的群众文化活动输送了新鲜血液，发挥了补给性填充的作用。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活动内容上，引入了特色民族文化、古老民俗文化、现代流行文化元素。如有注重整体协调、气势恢宏的藏族锅庄舞，强调个性展示、动作纷繁的新疆舞，还有追求时尚、创造新鲜的现代水兵舞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文化活动。一些文

化资源在经过交换以后，会产生“裂变效应”，也即类型可以多次变换，形式更加多样，进一步充盈着文化资源。其次，在人才资源上，城市人口流动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增添了多样的参与群体，不仅有少数民族朋友，也有民间艺人，更不乏具备专业才能的职业艺人，丰富的人才资源成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不竭动力。再次，在信息资源上，现代信息科技也是一种文化资源。群众在参与过程中，常常会借助网络工具及时学习新的文化表演形式，以形成团队的绝对竞争力。因此，文化资源已经成为群众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内容的重要补给，是引导群众性文化活动脱离媚俗化、平庸性的有力武器，深度彰显了文化资源的价值性，使群众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获得了长久发展的生命力。

表 4-13 “文化资源”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文化资源	QQ203 秦腔是咱们中华民族特别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咱们甘肃这一带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资源）
	XJ241 新疆舞是民族舞里面比较独特的，不好学，但是新疆舞蹈文化底蕴深厚，更有美感（民族特色）（文化底蕴）（文化特质）
	PG305 之所以选择这个舞蹈呢，也就是一种趋势，我们从网上看的，跳这种舞蹈的人很多（网络资源）（流行舞蹈）
	GZ65 我们也从视频上学习新的舞蹈，现代网络技术这么发达，我们也能看看别人跳的什么舞（信息资源）
	PG197 现在能看到的民族舞蹈越来越多了，关键是相比一般的舞蹈，民族舞更好看呀，人都爱看就有人去学，试着跳一跳，咱们国家的民族这么多，又都不一样，所以还是民族的东西更独特些（民族文化）

（三）环境机制：娱乐氛围的调剂性渲染

从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过程来看，物理场所奠定了空间基础，文化资源填充了活动内容，在二者建立的基础上，便形成一定的环境机制——娱乐氛围。从表象看，环境是人在一定情境中的所见所闻，必然以某些实体为支撑，如公园、广场、户外空地等场所，人们在实体环境中能够切身感受到周围事物的外在形态。从实质看，环境就是与人发生效应的人的境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表象是文化活动在公共场所的开展，实则是文化环境的无形营造，也即娱乐氛围的调剂性渲染。当团队整体开展活动时，悠扬的歌声、锣鼓喧天的乐器、欢快的舞姿，其中所散发出来的娱乐气息交织在一起，围绕在城市上空，周围的旁观者则可以寻找他们感兴趣的活动的驻足停留、默默欣赏。由于大多数文化团队都有着

常态化的表演机制，活动时间和地点相对固定，旁观爱好者就可以在固定的时间去观看一场免费的文化演出。久而久之，当旁观者与活动者产生情感共鸣时，便会尝试加入其中。此外，受既有的文化团体影响，周围会逐渐掀起一番组建热潮，只要具有文化爱好，就可以三五成群地组成一个团队，有效增加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能力。由此，以娱乐氛围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机制成为文化空间构建的重要支撑，因发挥着娱乐氛围的渲染性功能而对旁观者产生一种深刻的感染力，从而成为文化空间的拓展工具。

表 4-14 “娱乐氛围”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娱乐氛围	PG59 以前是看他们跳舞，觉得氛围好得很，就是这样参与进来的（氛围感染）
	XJ68 有的人还在徘徊呢，看的人也多，有的没有见过，觉得很新鲜，也想试试（氛围感染）（跃跃欲试）
	PG76 音乐好听，我们就听听，挺舒服的（音乐美感）
	XJ100 有时候出来转的时候发现这些舞蹈很有感染力，新疆的音乐欢快的很，人听着开心，人就喜欢（氛围感染）
	GZ109 来这个公园遛弯就看见有人在跳锅庄舞，所以后来就加入进来了，每天都来跳跳，对心情也有一种舒展作用（氛围带动）
	PG162 音响好，舞曲好听，跳的也舒服，有感染力（音乐优美）（氛围渲染）

（四）心理机制：文化与情感的互溶

环境机制的构建源于物质层面的基础支撑弥合精神层面的中介辅助，物理空间“框定”着文化空间形成的方式与结果，而文化空间也制约、影响着群众的心理行为与行为意识。当人们在一定的物理空间进行文化活动的生产和实践时，文化空间对群众有一种“引导性制约”作用，面对不同情景，群众往往由“被动式反射”行为转化成“耳濡目染式习惯”，最后走向一种“主动式参与”行为。因此文化空间在影响人们行为的同时，也形塑着思维和心理。群众开展自主性的文化活动时，无论是活动者还是旁观者都能在其中感受最为生动的文化生活和体验，这些体验能够与人的内心碰撞，产生文化与情感的交互效应。久而久之，常在文化氛围渲染之下的人们逐渐会产生一种文化依赖，一旦生活中缺少文化娱乐活动，则会感到生活的寂寥和清冷，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生活状态中。随着时间的绵延，文化环境不仅改变了群众的娱乐心态，随之而来很可能是人们的行为习惯、意志

情趣、生活理念、价值取向的转变，达到了文化内涵与情感的互溶效果。因此，文化环境不仅是文化活动的存在方式，更是一种具有文化气息的意义空间，它体现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和理想表达，成为文化空间构建的核心内蕴。

表 4-15 “文化与情感互溶”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文化与情感互溶	<p>XY358 自从参加了合唱团以后，觉得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了，心情也愉快，就想每天来这里唱歌，好像离不开了一样（难以离开）</p> <p>QQ248 经常来唱一唱，心里的烦心事好像就消散了。你看广场上人那么多，都是来娱乐的，生活也觉得不无聊了（舒缓心情）</p> <p>QQ341 唱的心情愉快、舒服呀，一段时间不出来活动，心情郁闷的很（愉悦身心）</p> <p>GZ301 跳舞时间长了，好像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感情，觉得生活离不开它（文化依赖感）</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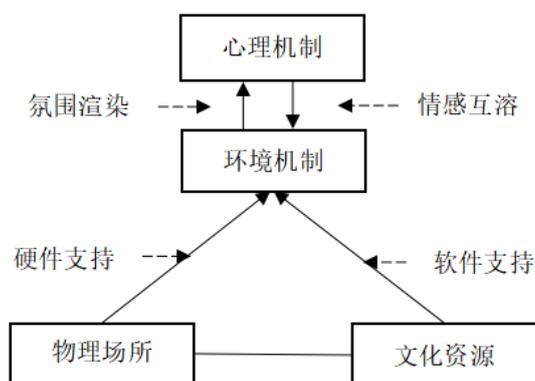


图 4-2 文化空间整合逻辑关系图

文化空间是在文化理论视角下观察城市的一种尺度^[26]，它不仅指代具有物理形态的具体位置，还象征着弥漫于城市空间下的一种文化环境，包含着文化氛围与气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经开创性地提出空间生产思想，他认为社会空间是由“空间实践”“空间表述”“表述空间”的解构与重构，也即“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有机结合^[27]。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来说，文化空间以一定的物理空间为客观基础，又经过娱乐氛围促成环境机制的建构，衍生出群众自愿参与、自主管理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意识，最终达到文化与情感水乳交融的效果。可以说，文化空间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外在情景与内在心理的叠加而生，同时又呈现出外在环境影响心理情感的延伸效应，这对于城市发展的方向、风格的形成及价值追求意味悠远。

五、社会资本积累——自主供给的默契重组

人们在公共文化空间“创生”的过程中也不断在改造着自身的精神世界，生产着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存在给了社会资本生长的土壤。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是在无休止的社会交往中的转换而被创造并维持的。^[28]”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社会资本围绕着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是本研究探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鲜明视角。纵观群众性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全局，是促进群众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增效器。经过编码，本研究得出四个主范畴，分别是“联系机制”“互惠机制”“信任机制”以及“非正式制度”，因此，本研究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联系机制：社群网络的模式化构建

在持续的社会交往中，联系机制无疑成为发展社会关系网络的第一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源于群众多样的文化诉求而进行自主组建、自主管理的过程，一方面，从团队内部看，文化团队在组建过程中会不断吸收新成员进入组织。首先，成员与团队处于一种陌生状态下，需要双方的沟通和认识，但这种沟通和认识并非都是正式的，通常大多的认识都源于陌生成员尝试心理下的默默跟随，随着时间的推移，陌生成员会逐渐与既有成员了解并熟悉，随后以一种非正式方式进入组织。其次，文化团队作为一个整体，在既有成员内部之间通常在关系确定下来后会确定一种团队成员的联系机制，该联系机制一般都会以成立微信群的方式呈现，微信群已经成为人们在线交流最活跃的方式，团队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微信群内进行通知，极大地方便了团队成员之间的联系。当这种联系机制成为常态，团队成员的沟通与交流不再限制为与团队相关的话题，而是可以拓展到生活中的琐事，延伸了成员的沟通渠道，该联系机制也成为成员生活的一种调解方式，这是内部—内部的联系机制。

另一方面，从团队外部来看，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文化团队，都会不定时地参与一些文化展演、比赛、汇演等活动，团队则需要与其他团队成员、活动举办方、参赛对手进行联系和沟通，此时便形成团队内部—外部的联系机制。无论是团队内部还是团队与外界的相互联系，在形式上都形成塑造社会关系的第一环节。在

社会关系网络中，成员不断交换着信息资源、技术资源、人脉资源，甚至是关系资源，而不同团队的成员们便存在于亲属关系、职业关系、组织关系、邻里关系等之中，这样的社群关系在时间的脉络里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模式化的建构，通过非制度化的人际关系和相对固定的行为而得到保障。

表 4-16 “联系机制”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联系机制	<p>XJ216 慢慢我们就弄了个群，大家都正在手机里联系着，互相交流着（建立微信群）</p> <p>GZ195 已经建立起来了微信群，平时有什么活动、消息就在群里直接通知了，比较方便（利用微信群通知相关事宜）</p> <p>QQ111 我们已经是建立一个微信群，平时大家也能互相聊聊天，说说生活中的事情，有什么困难也能互相帮个忙（借助网络平台相互联系）</p> <p>XY112 有时候也和其他团队联系着组织个比赛活动，我们与其他团队都相互熟悉了，因为经常在联系（与其他团队建立联系）</p> <p>XY113 我们团队所有的外出演出活动都是我给联系的，比如保险公司开业就会找到我们为他们演出，后来就互相认识了（联系演出活动）</p>

（二）互惠机制：社群成员的常态化帮扶

社会资本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及其持续互动的过程中。文化团队作为关系集合体，团队成员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团队关系中形成了彼此的关系认同和情感弥合，并且树立了一致性的团队发展目标，因此成员之间就会逐渐形成非正式的常态化帮扶机制。对待新进入的成员，既有成员会义务性地给予指导，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团队。已熟悉的成员之间以文化活动为纽带会形成“日常生活性”交往，主要体现为成员之间的娱乐、聊天、生活互助等方面，由于该交往方式具有日常性、频繁性的特点，且一般并不涉及利益或基于特定目的，有利于加深群众之间关系的紧密性，从而使成员的关系网络更加具有稳固性。

如果将团队内部成员的常态化帮扶视为“局部性互惠”，那么团队与外界的互利合作则为“普遍性互惠”。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群众性文化团体为基本单元的关系网络会逐步扩展到更大范围内的合作体，他们或是联结其他文化团体、社会组织、市场、基层政府部门等等，通过合作形式达成互惠互利模式。例如一些文化团队会选择义务性出演社区、企业等部门组织的活动，相对的，实际上这些部门也为团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表演机会，双方在互惠合作中不断创造着新的资源集

合体和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建立了表达友好的沟通机制，形成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交往，也在实践过程中契合了彼此需求。这是一种基于道德而非法律、基于普遍而非均衡的互惠规范——通过意见的交流、共识的达成、协调的行动在交往、合作中形成了一系列认同关系，提高了社群成员的关系紧密度和团队整合度，也为获取更多资源提供了可能。因此，由团队内部向外围不断渗透的行动过程为社群成员的个人发展形成了常态化的帮扶，也为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了互惠机制，成为社会资本的主要观测点。

表 4-17 “互惠机制”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互惠机制	<p>GZ176 大家在一起跳舞，就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相互学习）</p> <p>XJ188 一开始我不太会跳，是队里的成员教着我跳的，他们都很热情（老成员指导新成员）</p> <p>XY211 买二胡不能让我们师傅一个人掏钱，得大家一起凑钱买（奉献意识）</p> <p>XY246 我们在一起唱歌唱了三年多了，对彼此的生活都挺熟悉的，谁家需要帮忙的事我们只要有空就帮一把（生活互助）</p> <p>XJ375 我们经常给社区表演节目，他们有个什么活动就联系到我们，让我们去表演，我觉得对双方都是一个机会（各取所需）</p>

（三）信任机制：社群网络的潜在性成长

信任是构成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个体对于他人行为是否会遵守规则或标准的一种积极的反馈行为。卢曼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又可以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29]。公共文化空间影响并制约着社群成员信任的产生及作用，这里讲的信任，是基于团队成员在交往过程中个体或群体之间形成的普遍信任关系，主要包含了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一方面，成员的相互交往是彼此认知、熟悉的重要场域，当形成一定的交流空间和信息集合体，尤其以“零距离”的方式获取大量丰富的信息来源，这为成员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当个体感知到自己与其他成员具备相同的文化符号、思想意识、价值观时，个体间更容易在团队中产生信任感。另一方面，公共活动空间为团队成员提供了一个交往空间，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成员产生了自然的情感联系和心理认同，也即生产着成员之间的情感信任。文化团队作为一个关系集合体，必然具有一定的团体意识，团体意识则为成员增强团队归属感提供了情感信任的“培育

场”，成员在长此以往的交流互动中更能增加团队归属感与凝聚力，无形之中也就建立、强化了团队中的信任关系。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科·福山（Francis Fukuyama）特别强调了信任的重要性，他认为“信任像一种润滑剂，它使一个群体能够更有效地运作。”^[30]信任机制一旦建立起来，便能推动社群网络的交错性和潜在性成长。

表 4-18 “信任机制”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信任机制	<p>GZ154 买服装的话我们就把钱交给队长，她帮我们一起买上就行了（信任队长）</p> <p>XY97 大家的人际关系比较和谐，所以也不存在不信任的情况（相互信任）</p> <p>QQ201 我们原先都是一个地方出来打工的，都是熟人，也比较信任，所以才聚到一块唱秦腔（原始信任）</p> <p>XY331 我们从队员成为朋友，都好几年了，关系处得很好的，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就帮一把，毕竟大家在一起都这么久了（相互帮忙）</p> <p>XJ321 队长带领我们这么长时间了，他办事我们放心（对队长放心）</p> <p>XJ332 一开始不咋熟悉，后来熟悉之后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也都能说到一起去，觉得大家是彼此关照的（志同道合）</p>

（四）非正式制度：社群网络的共在性惯习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主要表现为一定的习俗、价值观、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等内容^[31]。相比国家的法律、政策、规章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更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属性，一旦形成，就会对人们的观念意识、行为模式具有某种约束作用。在群体性文化活动中，非正式制度也同样呈现着群体规范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即使在日常文化活动中团队成员也身着统一演出服装，演出服装作为一个团队最为鲜明的文化符号，彰显着团队品牌内涵，也意味着团队发展已经步入正轨。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团队均由群众自发性组建，为了应对日常开销，成员就必须自行承担相应费用，一般由负责人收取，用于日常活动的电费缴纳、设备服装的购置、材料印发等开销，但是此项费用由个人自愿上交，并非强制。这种自愿承担活动费用的行为也成为一种非正式惯例，体现着团队成员着眼集体利益的自愿行为。如果将一个文化团队看作一个“微单元”，那么这些非正式制度就是成员之间的心理契约和共识，也即当成员维持一定人际关系时，依靠共同的参照和微妙的心理机制，非正

式制度往往以一种隐性规范的角色彰显在团队发展过程中的“自我管理”“自觉维护”的共在性惯习。相比硬性而冰冷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通常能更加有效地推动团队及社群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形成。

表 4-19 “非正式制度”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非正式制度	<p>XJ301 我们队伍都有统一的服装，春夏秋冬的都有,只要在广场上跳舞，我么都会把服装穿上，一是为了好看、整齐，二也是因为我们团队比较正式（统一服装）</p> <p>XY99 每个人每月交十块钱的电费钱，都是自愿交的，队里不强制，但是我认为只要是这个队里的一员，就应该交这个钱，大家都交，是为了大家在一起唱歌的（主动承担费用）</p> <p>GZ156 每次跳舞的时候都要把服装穿上，自己来的时候就带着服装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嘛，这样才显得整齐,跳起舞来也好看（心理契约）</p> <p>XY218 我们天天都来，十点钟就都到了，已经是雷打不动的了（活动常态化）</p>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创生了社会资本，反之社会资本也使得群众自主性文化活动更为默契。基于社会网络的互动关系，群众自发性的文化活动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内部与外部的联系机制，局部性与普遍性的互惠机制，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团队成员的共同参照以及隐性规范的非正式制度，共同促成了社会资本的形与积淀。社会网络、信任和互惠性规范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32]，显然，社会资本的形是群众对基层公共文化自主供给的必然过程，其不断积累使得范围更广、强度更高的群众自主供给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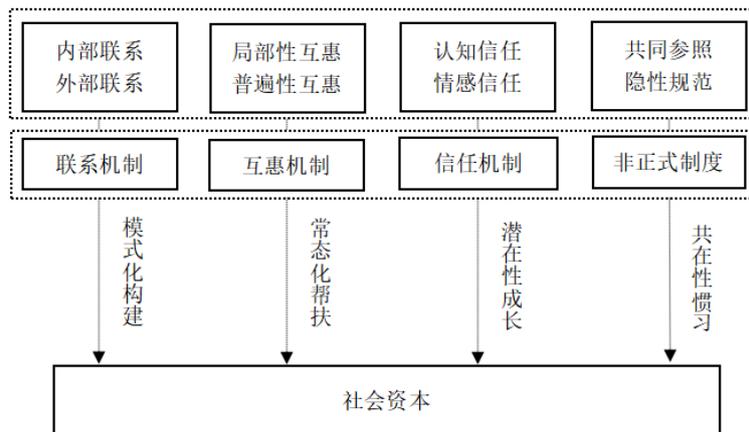


图 4-3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中社会资本形成过程

六、情感价值回归——自主供给的文化呈现

“文化”是一个极为宏观的概念，不仅包括人们创造的一系列物质要素，还包括诸如精神、信念、价值观、情感等精神要素。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最终目的是有效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在这一供给过程中，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在文化活动所得到的价值归属感，这是自主供给逻辑终端的深层力量，也是其文化呈现的最佳表征。经过编码，本研究归纳出两个主范畴，分别是“自我效能感”与“公共精神”，二者交互发生，构成了群众自主供给的价值回归路线。

（一）自我效能感的逐步渗透

“自我效能感”最初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提出，是指“人们对能否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某种工作行为的自信”^[33]，也即对个体能力保有一种确切的信念。群众之所以热衷于自主性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是因为多元的文化活动使得群众能够收获着实丰富的“自我效能感”，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生活状态的改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要参与者，他们往往处于一种寂寥的生活状态中，而文化活动则可以充当生活调味品，不仅可以填充老年时光的空白，改变以往退休后无所适从的生活状态，还可以有效拓宽人际交流，延伸交往渠道，找回个人存在感。第二，心理状态的调整，参与者通常能在文化活动中达到展示自我的目的，从而收获心理上的获得感与自豪感，这种获得感或来自于团队成员的鼓励，或来自于旁观者赞许，尤其对于队长、领唱（舞）者等“明星角色”来说，集体性活动更能增加他们的优越感和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也成为增强团队凝聚力的关键因素。

群众在文化活动所获得的心理慰藉、优越感、自豪感甚至荣誉感都能提升自我效能感，以往成败的经历对自我效能感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成功的经验会增强自我效能感，反之失败的经验则会削弱自我效能感^[34]。与此同时，“自我效能感”的强弱也影响着个体对行为的选择以及努力程度，无论是生活状态还是心理状态，文化活动参与者总能在其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经过时间的沉淀，自我效能感会逐步渗透在个人日常生活中，进一步增强了参与群体性文化活动的意愿，这对于群众自发性开展文化活动具有内在推动的重要意义。

表 4-20 “自我效能感”范畴的编码例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自我效能感	XJ12 不管跳什么舞，能把人的情绪抒发出来，在家里待着吧不舒服，要出来就高兴一点，也是一种解除烦恼的一种方式（解除烦恼） XJ250 我们之前也有一个正式的台舞，已经演出了好多场了，获奖也挺多的了，所以我们感觉挺自豪的！（自豪感）（荣誉感） XJ63 跳舞把人的情绪就释放出来了，心情就好了，包括唱歌都是，喊一喊就把忧愁这些喊出来了（释放忧愁） GZ20 跳舞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享受的(自我享受) GZ106 比如说有个动作我学会了我可以给他们教，慢慢就能把关系建立起来了，对人际关系的是一个促进，人际圈子就大了（扩大交际圈） XY103 最大的收获就是心情愉快，心情愉快干什么都有兴趣了，生活也就轻松了，人活得年轻了，上班的时候按部就班的，感觉挺枯燥的，到这个地方来，心情就好多了（愉悦身心）（调节生活） GZ202 把这个快乐带给自己也带给大家（传播快乐） QQ171 已经认识好多人了，东方红广场的人也认识我，金轮广场多人也认识我，他们就愿意围着我听我唱（明星效应） QQ258 每当唱戏时，粉丝就前来捧场助威。因为有了这么多粉丝的关注，他们唱起戏来更有劲了（优越感） PG72 跳舞是为了把身体舒展开来，精神面貌也就好了，心态也变年轻了，对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好处（益于身心健康）

（二）公共精神的不断延伸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公共性”，不仅存在于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内，也体现在群众内化的公共精神上。群众自主供给的行为本身就是公民参与意识和主体意识的鲜明体现，基于社群网络的联结、规范、互惠与信任，成员之间很容易形成强韧的聚合力，同时也衍生出基于个人道德规范、奉献意识的公共精神。一方面，在群体性活动中，因权利和义务的无规定性，成员往往自主地承担团队事务，尤其以队长或团队负责人为主要带头人，以互惠关系为团队发展和自我发展的认同基础，成员逐渐树立了一种积极参与、平等合作、邻里友好的公共意识。另一方面，囿于传统文化流失危机日渐严重，一些老艺人以拾起传统文化为最质朴的初衷，努力唤醒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展现了一种深厚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在公共空间内，个体的行为往往能够产生一种“模仿效应”——能够对其他人产生无形的引导作用，人们的交往越频繁，交互影响就越明显，公共意识随之有了产生的可能。公共精神的存在不断突破着人们自私冷漠的“德性困境”^[35]，呈现的则是“人人相善其群”的传统公德。因此，正是由于公共精神的

延伸给予了广大群众道德范式的指引,才使得群众对自发性的公共文化有了情感价值的体现,使得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有了“精神—现象”的路径轨迹。

表 4-21 “公共精神”范畴的编码列举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公共精神	XY98 音响是我自己家的,去年我连音响钱、电费一分都没收,这是大家共同的爱好,没必要那么斤斤计较(志愿精神)
	QQ189 这些乐器都是我买的,全都是我一个人买的(奉献意识)
	QQ206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文化重新捡起来,发扬光大,不然慢慢都没人知道还有这个戏曲(社会责任感)
	XJ190 就是为了娱乐,大家在一起开心快乐、健康,自己就掏钱去买这些乐器,也没什么(公共精神)
	GZ373 跳舞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精神粮食”,是一种文化享受,而这种享受是要分享的,而不是独自享受的(分享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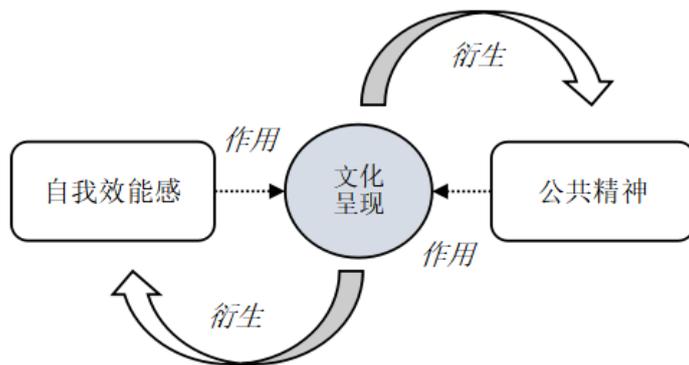


图 4-4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情感价值的回归路线图

七、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梳理

（一）内生需求与外在支持：自主供给的逻辑原点

群众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逻辑原点由“内生需求”和“外在支持”两大范畴构成。“需求”源于集体内部不满足、不平衡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这种状态刺激机体产生去寻求满足、弥补缺失的某种行为。文化需求作为人的精神需要,是基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更高阶段的需求,彰显着个体的精神内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面向的欲望,也正是这种与经济发展水平应运而生的内生需求,成为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产生的最原始动机。在社会发展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人们不再为生计而奔波劳苦,思想逐渐开化,更加注重精神层次的文化享

受和主体价值的彰显。因此，个人的主观文化爱好和健康意识逐渐浮出水面，认知观念也由封闭转向开放，人们不再刻意压制自己的内在喜好，而是更加乐于展现在公众视野中。加之中老年群体普遍怀有对过去生活记忆和某种心理情愫的催化，使得他们将这种记忆和情愫寄托于生动的文化活动而得以重现。因此，无论是感官上单向度的享受，还是积极投身其中的主体性参与，都无不彰显着群众多元向度的文化需求。

社会环境的变化展现着日新月异的变换节奏，城镇、农村人口的潮流涌动加速了城乡融合的社会形态，人口的地域转移既有赖于经济的地域转移，也带动着文化的地域转移。加之国家层面大力提倡的普惠共赢的文化政策让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如沐春风，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向好态势，都为群众的公共文化生活增添了“一臂之力”，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有了内外兼具的逻辑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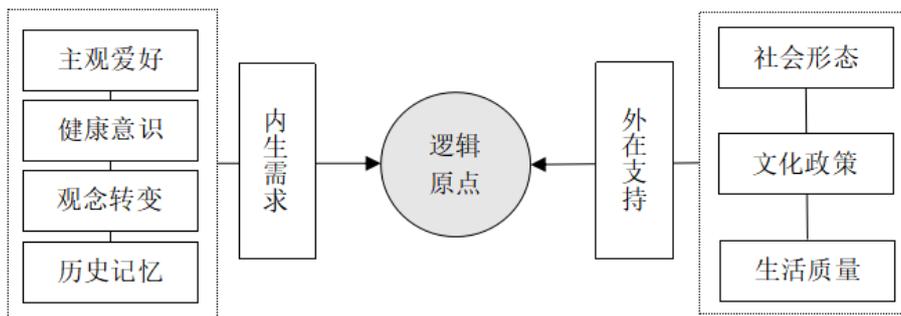


图 4-5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逻辑原点结构图

（二）载体构建与空间整合：自主供给的逻辑进路

基于群众普遍的文化需求和社会条件的外在支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发展路径步入“载体构建”和“空间整合”范畴，这两大主范畴共同构成了自主供给的逻辑进路。首先，自发性文化团队往往最初由一位或几位主要发起人提出倡议，三五成群地组建起一个非正式团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亮相”，逐渐吸引了志趣相投的“旁观者”，经过一种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后加入组织，在与团队既有成员的相互熟悉过程中逐渐将个人关系、价值观、人脉等资源“嵌入”团队，形成“组织认同吸纳，个人关系嵌入”的进入机制。其次，在长期的团队共同活动过程中，源于日复一日的沟通、磨合，团队成员的文化偏好、行为意识等呈现出

趋于一致的整体倾向，于是出现了团队共同的“心理参照”，使成员逐步获得了情感共鸣。情感共鸣一旦产生，对团队整体发展有着强有力的粘合作用，是推动成员产生“共融心理”的催化剂。最后，当团队发展至成熟阶段，往往会以树立一定的品牌来提升形象价值，通常表现为“取名称”“喊口号”“统一服装”等具体方式，不仅使团队特征更加鲜明，也树立了一种积极的外在形象。

如果将文化团队视为一个“子系统”，那么文化空间则是多个“子系统”的集合体。其中，以物理场所为基本的硬件支持，以文化资源为必要的软件支持，构成了文化空间的客观存在。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映照下，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以后，各个层级的政府部门都着眼于满足群众的公共文化需求，保障其文化权利的实现为重点工作内容，尤其以建立健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为工作开展的首要任务，在城市范围内已经初步完善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为群众集体性文化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与此同时，群众集体性的文化活动所散发的大众化、普惠性的文化魅力无疑又对群众营造了一种具有“云氛围”的文化场域，形成一种具有晕染效果的娱乐氛围，构成了文化空间重要的支撑力，在长此以往的氛围感染中，群众内心极易形成“文化依赖感”，从而引导群众走向“主动式参与”阶段。由是观之，在物理场所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之上，娱乐性的环境氛围和文化情感的相互交织构成了文化的内生空间，打通了基层群众自主供给的逻辑进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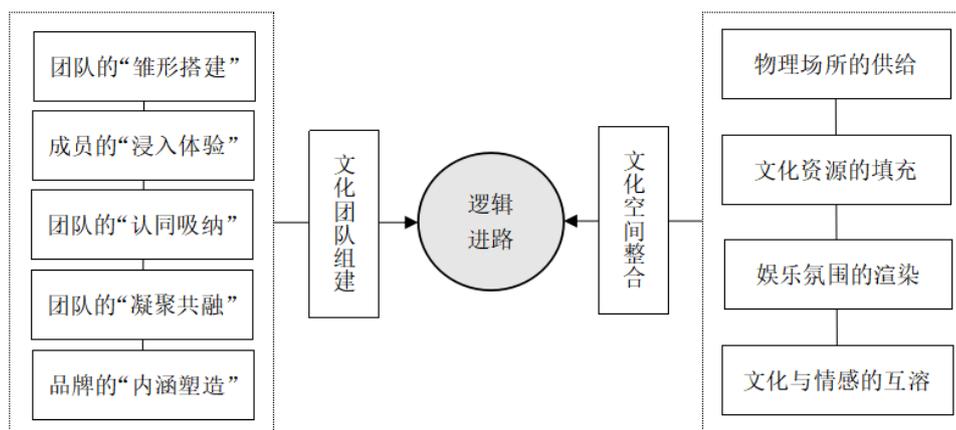


图 4-6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逻辑进路结构图

（三）心理默契与价值回归：自主供给的逻辑终端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在经历了逻辑原点的生成阶段、逻辑进路的发展阶段，迎来了逻辑终端的拓展阶段。经过编码，自主供给的逻辑终端由“社会资本”与“情感价值”两大主范畴构成。其中“社会资本”由“联系机制”“信任机制”“互惠机制”和“非正式制度”四个副范畴构成。首先，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行为的本质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具有开放性的群体活动，从该行为伊始，就难以脱离联系机制的作用，无论是内部成员的互相交流，还是团队与外部组织的互联沟通，联系机制无疑成为打破封闭环境的第一步。其次，依托团队成员在长期相处过程中常态化的帮扶、资源的共享与交换，无形之中形成了互惠互信、情感联结、价值认同的合作性动力要素，这为社群网络的潜在性成长加足了马力。加之组织内部非正式制度的结构性嵌入，使得社群单元有了共同参照和隐性规范，也成为成员的心理契约和共识达成。综上，社会资本的形成既是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也是形成互助互惠互信的关系格局的保障，使得群众自主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有了更为深厚的心理默契。

“情感价值”范畴由“自我效能感”和“公共精神”两个副范畴构成。自我效能感体现着个人对于行为的预期心理和真实感受。群众之所以热衷于集体性的文化活动，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其中得到丰富的获得感，也即自我满足的心理需求——身心的愉悦感、精神的富足感，或是在公共场合展示风采的自豪感等等，这种情感丰富的心理机制往往扮演着内生需求的“催化剂”的角色——自我效能感越强烈，则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动机越强烈，与群众的持续性参与文化自主供给形成了闭环线路。此外，随着社会不断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公民的“主体意识”和“个人价值”呈现出愈加明显的延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公共事务上展现出一种积极参与、邻里友好的公德意识。这种以公共利益为基准点的精神逐步渗透在更为广泛的群体活动中，就能使自主性参与更上一层楼，对于推动群众树立公共性规范、社会性道德有着最为生动的教育意义，也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最佳的文化呈现。

至此，以社会资本为支撑的心理默契和以情感价值为回归路径的自主供给完成了逻辑发展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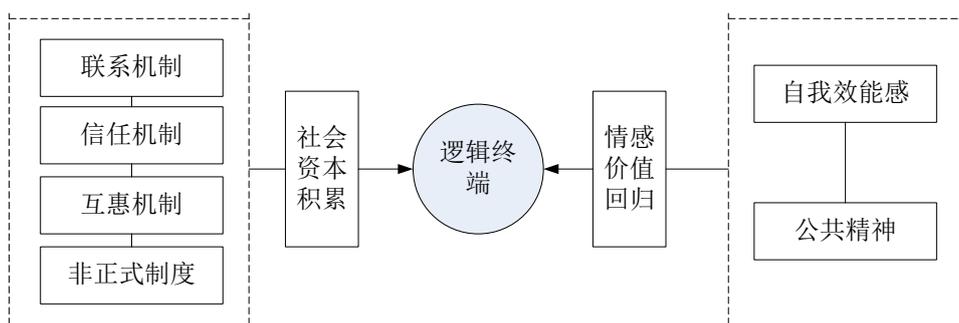


图 4-7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逻辑终端结构图

（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的模型构建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遵循了“逻辑起点——逻辑进路——逻辑终端”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路径，还折射出基层群众的内在心理和外在环境的叠加效应。其中，以群众的主观爱好、健康意识、观念转变和历史记忆构成的内生需求和社会形态、文化政策、生活质量构成的外在支持共同形成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逻辑起点。

基于群众内生的文化需求和不断丰盈的外部条件支持，组建文化团队并形成一定的文化空间成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最重要的支撑力量，也是推动其不断成熟的逻辑进路。总体来说，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属于“活动召集型”^[36]的公共文化空间，是由某些文化活动开展而聚合群众形成的文化空间，具有较强灵活性，因群众自发性文化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活动机制，所以进一步加强了“活动召集型”文化空间的建立。

直面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模式，显而易见并仅仅由群众的文化需求和社会支持、文化团队和文化空间的简单叠加而形成，这些由心理需求和外在形式统一起来的逻辑进路，折射的是更深层次的逻辑内涵——社会资本与情感价值。也正是因为这种珍贵的情感价值的回归，使得群众对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最终得以实现，成为整个供给行为的逻辑终端。

第五章 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模型修正

前一章通过编码技术对原始经验数据进行范畴归纳分析后，得出了城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生发逻辑，并构建起理论模型。但建立在原始经验数据基础上的模型还须与既有理论进行对照和互验，以使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遍解释力。因此，本章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基础，将群众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划分为“组织场域”“社区场域”和“社会场域”，以此为基础来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生发逻辑的理论回嵌

场域是实践者的社会行动空间。在整个社会场域之中，包含了多个大大小小的“社会子场域”，这些“子场域”还可以划分为更为细小的场域，也即“亚场域”。无论是大场域还是子场域，它们都包含了一定的逻辑必然性，用于维护各自场域的社会结构关系。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实践行动也同样衍生了大小不一的多场域。

（一）组织场域：文化资本、结构嵌入

组织场域聚焦于群众自发组建的文化团队。对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这一社会行为来说，如果将参与文化活动的群众视为场域中的“原子化个体”，那么文化团队就是最基本的“社群单元”，也即“社会小世界”中的组织场域。在该场域内，活动成员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最原始的动机是自身的主观兴趣，是具有共同爱好的行为群体一致的兴趣选择，兼具主观性与能动性的行为取向。一个组织场域的形成，需要组织发起者、活动参与者、组织维持者共同构建，因此组织场域是一个由客观关系的有机系统，该系统内存在人员进出、信息交换、情感共鸣、思维互动等多重影响，使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场域的实现成为可能。

在这一场域中，活动主体通常携带一定的“文化资本”进入组织。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类三种形式：身体化的形态——相对稳定的性情倾向，是一种内化了的秉性与才能；客体化的形态——以文化物品为具体体现；制度化的形态——以

特定的制度安排为体现^[37]。组织场域中的“文化资本”更倾向于身体化形态——新成员在自身文化偏好和精神需求的基础上，选择爱好相投的团队并加入，这体现的是一种品位气质或经验的性情倾向。另外，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本身就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源和才能，以实践行动为中介，使组织场域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社会空间，这也是文化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

组织场域并不是一个静止空间，而是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博弈”，每当有成员进入该场域内，不仅带来了自身的文化资本，也将结构嵌入组织，并给组织带来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包括信息和资源优势，也即组织场域获得了一部分“额外价值”——团队的正规化趋向，团队越正规，其“磁场效应”也就越明显，越能更多地吸引新成员进入组织场域。与此同时，有成员进入该场域，就有成员脱离该场域。所以，场域内同时存在着竞争与协同的作用力量，通过竞争走向协同，协同之后又会出现新一轮的竞争，从而推动着组织场域不断演化和发展。

（二）社区场域：社会资本、关系嵌入

相对于组织场域，社区场域则相当于多个组织场域的集合体，从物理属性和社会关系上看，社区场域相对于组织场域，其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宽泛，是承接组织场域和社会场域的“过渡空间”。这一场域通常聚集于街道、社区、广场、公园等一切用于文化活动的物理空间，所以社区场域具备开放性、扩散性的服务特点。实际上，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实践活动更多地落脚于社区场域内，它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这种关系网络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场域内人员、信息、偏好、结构的流动而发生变化，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关系网络。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不仅仅源于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更多的在于社区场域内的力量牵引机制。无论是活动的参与者，还是驻足停留的旁观者，都无一不受社区场域内的环境氛围所影响。群众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积极践行者，在供给过程中往往缺少不了团队内外的信息沟通与情感交流，这实际上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具体表现，长此以往，社群成员会在一种和谐友好、趣味相投的活动氛围中产生强烈的存在感与获得感，这种存在感与获得感内嵌于成员所在的社区场域内，久而久之便形成趋于一致的价值观念，也即“共在性惯习”，这是社群网络潜在性的成长方式。

基于社区场域的空间开放性和内容扩散性的本质属性，场域的发展和演化通常伴有“关系嵌入”这一行为机制。“关系嵌入”在很多方面影响着组织间的资源交换、信息互动以及合作共享的开发等，主要强调了社群网络的关系特征，其中行为主体的信任程度、亲密程度、合作取向、价值判断都对未来的行为结果产生直接影响。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四个指标来衡量关系的强度程度——“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互相服务内容”以及“关系持续时间”^[38]，因此社区场域内的“关系嵌入”也直接映射了社会资本的生成逻辑，在群众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心理参照”和“隐性规范”，成为社区场域存在的内生力量。

（三）社会场域：象征资本、认知嵌入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社会场域是结构最为复杂的一个社会空间，它包含了组织场域和社区场域等多个“亚场域”，因此社会场域是整体资源和结构的集合体。群众的自发性供给这一实践活动，是由离散到聚合的行为发生过程，也是自主意识自下而上的建构过程，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群众基础的公共文化价值的实践行为。这一过程中，不仅包含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同时也隐含了政府对基层公共文化的引导和支持作用，体现了国家制度结构与政策资源交织的场域力量。

基于社会场域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特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通常展现着“象征资本”的重要地位。“象征资本”是场域理论中继“文化资本”提出后讨论社会结构与表征符号体系之间联系的概念，可以简单归结为一种信誉、声誉或名望，就此而言，象征资本是一种建构的权力，这种权力以一种隐含的方式得到场域和认同者的支持^[39]。所以，在这一认同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发生着“认知嵌入”的过程。针对于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这一行为，本质上是具有文化内涵的——从主观视角来看，群众更加愿意张扬自我个性，自主性观念得到了很大进步，将个人兴趣与活动意愿施展出来。从客观视角来看，不断完善的社会场域给予群众一种艺术、语言、阶级等意义体系下的象征资本，所以象征符号作为人们交流和认知的结构被嵌入行动者身体，转化成一种被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成为内在的感知体系。符号是社会结构和个体心理结构的传递媒介，社会结构通过符号转化为个体的心理结构，形成新的心理结构，从而实现对社会结构的重建^[40]。在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社会场域中，个体的心理结构表现为一种文化偏好的惯习，所以象征资本有助于社会场域和个人惯习的相互塑造功能，这也就为社会场域中公共文化活动中对群众的认知嵌入提供了强大的解释力。

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生发逻辑的重新审视

（一）组织系统要素协同：从波动到稳态的互动逻辑

就组织场域而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是以文化品位相同、兴趣爱好相投的文化活动者为组建基础，是将“原子化个体”汇聚一体，形成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又含有力量斗争的场域，该场域并未有政府机构力量的介入，因此具有完全的自主性。文化团队作为组织场域得以存在的实体基础，它的稳定与否攸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场域能否健全发展。实际上，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系统并非一直存在于平衡条件下，而是远离平衡状态，系统内的物质、信息、能量的良性互动是组织系统从“波动”到“稳态”的平衡器，也是组织实现从无序向有序进化的根本机制。组织场域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与能量不断交换的空间，系统内部各要素也是分布不均的，如果出现内外资源的流动时就必然带来系统的非平衡变化。

群众自发组建的文化团队中，无论是人脉的交换、信息的输送、利益取向的变化，还是成员关系的亲疏，都对系统要素的浮动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发展良好的文化团队，通常具有管理规范、氛围良好、成员和谐、内外激励共存的几大特点，从陌生成员的热情吸纳到关系认同、从团队氛围的积极营造到组织文化认同，甚至团队的品牌建立，都展现了组织要素不断转化、传递的作用机制。从这一点上来说，组织系统的要素协同，是使组织从“波动”到“稳态”的重要推手，其中的互动逻辑也成为了组织场域不断发展至成熟的实践进路。

（二）社群网络关系塑造：从关系到资源的交换逻辑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社群网络是衔接与群众与社会结构的中介，它既是多个文化团队及活动组织的“圈层结构”集合体，也是构成公共文化空间的关系网络。直面群众自发性文化活动，无一不是建立在社群网络的基础上而形成，

这一阶段更加倾向于自主供给生发逻辑的发展阶段，由于社群关系往往伴有多边联系、多元合作、多方互惠的特点，所以其内在的关系逻辑显得更为复杂。一方面，不同文化活动组织内部的人员、信息等资源交换会从组织内部延伸至外部，形成人员的灵活流动、信息的多方传导以及关系的随意跳跃。另一方面，文化组织与外部的企业、社区、政府部门的“伙伴关系”，又使得社群关系的外延扩大化。

总体上看，社群网络的关系塑造处于社区场域内，遵循了从关系到资源的交换逻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集合体，在自主供给这一实践中，群众“热情高涨”的参与形式能够保证其参与持久性，因此社区场域内外的关系和资源交换也就具备了持久性这一特点。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一切社会的组合、团结、互助、合作以及相互适应，皆依赖于同类意识^[41]。也就是说，在关系和资源交换逻辑中，实际上隐含着文化价值观的一致性演化，它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文化活动成员因行动个体化而产生的阻力，成为社会群网络实践的“润滑剂”，这也正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社群网络走向聚合的动力所在，有力地保证了社群网络的良性发展和规范运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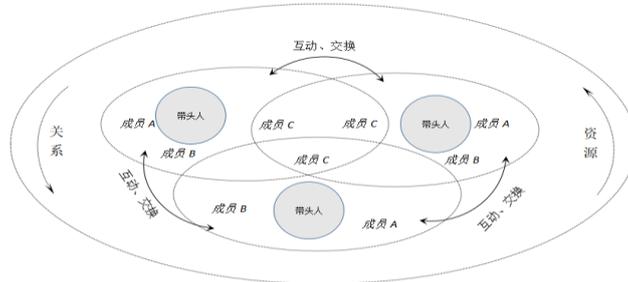


图 5-1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社群网络逻辑关系图

（三）微观文化生态渗透：从外在环境到主体意识的嵌套逻辑

结合组织系统和社群网络的发展路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生成与发展已经经历了从组织场域到社区场域的演化，从组织要素协同到网络关系建立的过程。纵观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内嵌着文化主体的能动性的作用机制。就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而言，最为核心的文化内涵就是群众不断形成的主观文化价值指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理想的治理归结于主体性的构建，如他所论，“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到自我的转变”^[42]。但是个

人的主体意识并非天生所具有，而是在后天一定的环境中习得。聚焦于群众自发性的文化活动这一行为中，“外在环境”则源自于微观文化的生态渗透，无论是自主供给的常态化活动，亦或是节庆日的文化展演、文艺比赛等，都在无形之中造就了一种娱乐氛围浓郁的公共文化空间，这一空间的重要作用展现在对文化活动中者本身和文化旁观者的多维感知力量——群众能在一种开放的空间中接触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感受精彩纷呈的文化氛围，从而在深入交往中产生精神层面的思想碰撞和灵魂深处的情感交流，使得承载公共文化活动的物理空间上升为群众的情感空间，同时人们也会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一定的心理建构，主要表现为“文化依赖性”，一旦缺少文化生活，则会感觉无所适从，甚至内心空虚。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对于这种由外在环境到主体意识的塑造过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他认为，人类身体的体验才是感知世界的来源，这种体验源自于身体在社会空间和环境的运动，只有将身体置身于实实在在的空间中，才能获得真实的体验与感知^[43]。因此，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外在环境更像一种“微场域”，文化主体在“微场域”内直观地发生视觉与听觉等多种综合知觉体验，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生活世界”。

综上，文化活动的“微场域”和整体社会文化环境的“社会场域”构成了一个微观的文化生态环境，主导着由外在环境到内在主体意识的塑造作用。换言之，群众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主体，理应构建起个体意识与文化环境相互联结的价值体系，以文化诉求为起点，以公共意识为内驱力，以满足文化需求为目的，实现自我的内在发展指向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外在发展理路的双重统一，从而唤起个体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为，这是从环境到思维的嵌套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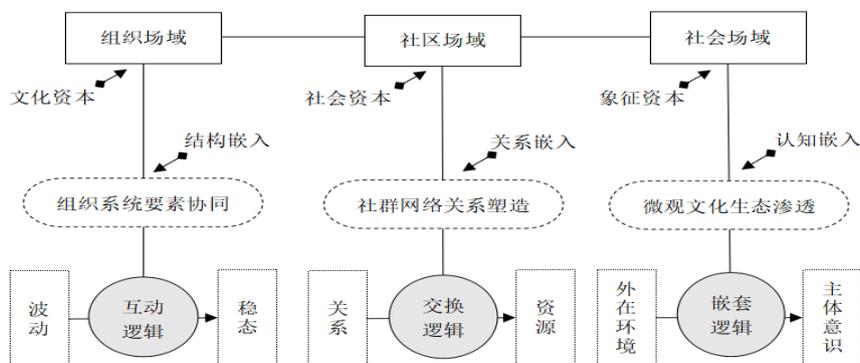


图 5-2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生发逻辑模型

第六章 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路径优化

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模式虽早已有之，但影响力有限，公共文化服务效果并不理想。在国家大力倡导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的制度背景下，探讨甘肃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优化路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制度环境

（一）明确基层政府的职责与角色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基层政府的重要职责，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效性也成为衡量基层政府职责履行程度的依据之一。对于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而言，基层政府的政策支持尤为重要，但也不能操之过急，需要明确其自身的职责与角色。第一，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要将服务理念转变为“以民为本”，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促使政府管理方式由“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第二，政府在文化建设中，扮演着提供者、生产者、推动者、培育者、监督者和合作者等角色，政府需要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鼓励社会资本、企业和民间力量的加入，为文化服务供给做出贡献，向群众提供差异性、公益性的文化服务，促进供给主体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确保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经费保障制度

经费问题向来是制约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效果提升的重要因素。虽然甘肃省积极相应国家号召，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包括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但经费保障制度仍不健全，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并不能有效保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自主供给。政府除了采取以奖代补、项目补贴、演出自主和招标采购等方法外，还应积极扶持基层群众业余文艺团队发展，不仅在建设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化广场等硬件方面给予支持，还应在活动参演机会等软件方面大力支持。通过制定具体可行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经费补贴办法，为基层民众的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经费保障，推动基层公

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可持续化发展。

（三）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与合作机制

基层政府在为公共文化自组织提供政策扶持的同时，还需要以科学合理的评价反馈机制作为保障。基于科学合理的评价反馈机制，基层政府既能够了解群众真正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又可以跟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实际效果，对政府下一步的供给决策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首先，通过评价反馈机制了解公共文化自组织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需求，为其提供经费、人才、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其次，建立政府与公共文化自组织间的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基层政府将公共文化自组织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库，通过向其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实现政府与自组织的双赢效果。

二、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孵化工作

（一）增强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开放性

自组织理论认为，只有在开放的系统中，自组织才能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使系统远离平衡状态，进而实现系统的循环与演化。要保证公共文化自组织能够不断朝着更高层次发展，就必须时刻保持组织的开放性，保证组织内部与外部之间信息、物质、能量交流的流畅性。开放性强的公共文化自组织，能够不断从外界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并且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身的发展策略。不仅能够提高公共文化自组织的整体水平，而且对于扩大自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当鼓励公共文化自组织积极吸纳新成员加入，主动吸收对于自组织发展有益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保持自组织发展的活力与激情，将提升社会影响力作为自组织发展的重要使命之一。

（二）确保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自主性

自主性是衡量公共文化自组织在治理体系中能否充分发挥应有功能的一项重要指标。其中，确保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自主决策与自我管理则是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功能发挥的先决条件。首先，将组织成员吸纳进入组织的管理决策过程中，使组织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管理格局，在这种管理格局下，使组织保持健

康稳定的发展态势，实现真正的自我管理。其次，地方政府部门应将行政管理与自治管理分开。在自治管理上，政府扮演引导者角色，主要负责外生制度的设置和经费资助。在与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合作过程中，不应当干预自组织所追求的价值与使命，充分尊重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合作意愿及方式。自组织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基础上，通过面对面的协商、讨论，合作供给公共产品。

（三）提高基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人才素养

较高水平的人才素养是确保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能力的关键要素，而服务能力高低不仅是衡量公共文化自组织能否获得地方政府政策扶持的重要依据，而且关系着组织向心力、感召力、团队氛围等组织文化的培育问题。现阶段，具备高质量服务能力的公共文化自组织很可能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合作伙伴。首先，建立公共文化自组织的人才扩充机制。政府通过政策优惠等举措，鼓励和支持组织能力强、热心公益的民众参加到公共文化自组织中来，由他们引导和开展文化服务工作。其次，完善公共文化自组织的人才培养机制。逐步建立“组织内相互学习+组织外专业指导”的人才培养机制，发挥自组织内部优秀文艺人才的特长，提升组织成员的专业素养。政府通过组织专业辅导培训活动，邀请行业专业人士为自组织提供专业性指导。

三、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质量水平

（一）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内容

在本研究中，七个案例所涉及的公共文化自组织类型包括广场舞组织、合唱团和秦腔自乐班三种，而这三种自组织类型一定程度上也是当前兰州市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典型代表，服务内容单一化构成制约公共文化自组织服务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由此，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质量水平，一方面需要不断丰富基层公共文化自主供给内容。通过政策宣传与引导，发挥本地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优势，逐步形成读书看报、电影放映、棋牌娱乐、合唱舞蹈、秦腔戏曲等内容丰富的公共文化自组织，打造“悦享书籍队”“电影放映队”“棋逢对手队”“秦腔自乐

班”等特色鲜明的文化自组织品牌，丰富公共文化自组织的服务内容。另一方面，以现有公共文化自组织为基础，逐步实现文化自组织从一般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向全民阅读、书香文化建设、非遗体验传承创意工作坊等更高精神层次的文化活动转型升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关怀。

（二）创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形式

现代媒介工具的运用已经成为当下文化传播的有力推手，公共文化服务也不例外，需要兼顾传统与现代的服务媒介工具，创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服务形式。首先，以“在地化”活动为主，夯实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群众基础。通过实地开展内容丰富的公共文化活动，为有文化需求的民众提供文化参与的机会和平台。其次，结合时下流行的“微传播”平台，充分利用微信、微博、快手、抖音等流行的社交软件，以“在线化”形式传播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内容，扩大活动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提升公共文化自组织的服务动力。再次，通过组织公共文化自组织间的交流竞赛活动，以竞赛、切磋的形式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活动，增强公共文化自组织的向心力，也有利于促进各组织间的相互了解与学习。

（三）拓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空间

目前，兰州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活动主要依托广场和公园展开，服务空间的有限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组织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外部效用。在公共文化服务重心下移、服务下移、资源下移的时代背景下，拓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的服务空间不仅成为可能，也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质量的必然选择。首先，在主要旅游景点设置公共文化自组织的活动平台，拓宽其横向服务空间。西安“大唐不夜城”是近期爆红网络的旅游景点，在相关部门的决策指导下，该景区专门设立了秦腔、民谣、皮影等“文化小舞台”，而演出团队皆为公共文化自组织，获得了很好的文化效益。其次，充分利用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契机，延伸公共文化自组织的纵向服务空间。在制定规划时，将公共文化自组织纳入节日文化集市、广场文艺演出、送戏进村和社区等活动，不仅可以为其提供才艺展示平台，而且可以利用“服务下移”的配套资源帮助自组织取得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 [1]李少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构成及其功能分析[J].社科纵横,2007(02):37-39.
- [2]张宏如,沈烈敏.大学生气质特征与元认知关系研究[J].心理科学,2003(02):377-378.
- [3]任致远.关于城市文化发展的思考[J].城市发展研究,2012,19(05):50-54.
- [4]董石桃.公民参与的价值认知及其发展——基于西方行政思想史的考察[J].中国行政管理,2013(07):45-49+119.
- [5]H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新公共行政[M].丁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6][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7]董石桃.公民参与和公共领域建设——基于阿伦特民主思想的阐释[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6(04):4-9.
- [8]张志勇.社会自组织视角下广场舞团队的健康发展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2015(5).
- [9]王珊.基于自组织理论的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研究[D].硕士,北京交通大学.2010(6).
- [10]鲍咏雪.奥运会自组织演进机理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9(3):51.
- [11]数据来源: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
- [12]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
- [13]龙室伊.城市公共空间的叙事性表达分析[D].湖南大学,2013.
- [14]文军,沈东.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逻辑与城市中心主义的兴起——基于国家、社会与个体的三维透视[J].探索与争鸣,2015(07):71-77.
- [15]数据来源: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
- [16]文军,沈东.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逻辑与城市中心主义的兴起——基于国家、社会与个体的三维透视[J].探索与争鸣,2015(07):71-77+2.
- [17]陈满琪.关系流动性、城市认同与居住流动意愿的关系[J].社会发展研究,2018,5(03):103-120+244.
- [18]资料来源:《关于对兰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http://www.gslzxx.gov.cn/news/index.php?c=show&id=2909>.
- [19]李鹏鸽.文化民生的功能及其实现——以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为视角[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15(06):109-111.
- [20]侯仕军.社会嵌入概念与结构的整合性解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1(02):86-94.
- [21]马克·格兰诺维特著.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22]黄永林,喻发胜,王晓红.中国社会转型期网络舆论的生成原因[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9(03):49-57.
- [23]陈波,张洁娴.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现实与未来设计——基于全国17省46社区的考察[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6):23-31.
- [24](日)加藤晃(著),江西省城市规划研究所译.城市交通和城市规划[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79:2-3
- [25]向云驹.论“文化空间”[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81-88.
- [26]马树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城市文化空间拓展[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

- 版),2010(06):58-61.
- [27]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 [28]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29]Uslaner E M, Conley R S . Civic Engagement and Particularized Trust: The Ties that Bind People to Their Ethnic Communities[J].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2003, 31(4):331-360.
- [30]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8-20.
- [31]章荣君.社会治理精细化趋势下“微治理”的生成逻辑[J/OL].*湖湘论坛*,2018(06):33-40
- [32]张勇.论社会资本在社区公共空间向度[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4(06):153-160.
- [33]Duane Brown.*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M]. San Francisco, 2002.
- [34]周文霞,郭桂萍.自我效能感:概念、理论和应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1):91-97.
- [35]王永益.社区公共精神培育与社区和谐善治: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J].*学海*,2013(04):101-106.
- [36]陈波,李婷婷.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再造:理论与模式构建[J].*艺术百家*,2015,31(06):64-71+112.
- [37]皮埃尔·布迪厄.实践[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38]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J]. *Sociological Theory*, 1983, 1(6):201-233.
- [39]张意.关于“看”的象征资本[J].*国外理论动态*,2010(06):87-92.
- [40]毕芙蓉.文化资本与符号暴力——论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J].*理论探讨*,2015(01):53-56.
- [41]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构建价值意识的学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100-102.
- [42] (法)米歇尔·福柯.福柯读本[M].汪民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241.
- [43]汪棠家.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法文本 1992 年版)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J]. *中国学术*, 2002(1):263-270.
- [44]李少惠,崔吉磊.中国公共文化治理的本土化建构[J]. *贵州社会科学*,2015(11):76-81. 新华文摘(网络版)2016(3)全文转载.